

第一卷第二二期

目錄

民族青年

朱家驊



5

論評

擁護國家總動員法的實施
革命的五月
懷念吳開先先生
太平洋戰爭決定在海軍

專載

科學研究之意見

朱家驊

論著

大學青年的政治素養問題
史的民生論與史的唯物論理論之商榷
論健康保險
心與物
動與靜
應如何澄認孔子
三民主義文獻問題

蕭宜芬
胡彥聖
胡體乾
羅鴻昭
老張
李笠
杜定友

譯述

告德意志國民

馬采

時事述評

李鶴飛

青年通訊 寫給現代青年的一封信

覺任

藝文 我對文學效用之體驗

雅人

夏之心願

何冠來

民族青年出版社編印

國民華中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出版

南京圖書館藏

擁護國家總動員法的實行

戰時國家總動員法，世界各國多已實行；我國自抗戰軍興，即已實行總動員法，頗著成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抗戰形勢為之一變；為把握時機，增強戰力，使所有力量都能適應軍事需要，運用于戰爭，故去年九中全會曾通過「加強國家總動員實施綱領」，本年三月廿九國民政府又正式公佈「國家總動員法」，并明令五月五日開始實行。吾人願于此時，促起全國同胞對「國家總動員法」應作深切的認識，因而抱定努力奉行的決心。

國家總動員法，優點極多，舉其要者，約有數端：第一、適合時機——我抗戰將屆滿五年，社會經濟，迄在自由放任的形態下，反觀敵國，則早已逐條實施其國家總動員法；此固可以說明我國力之弱，性之實，逾乎尋常。然自太平洋大戰爆發，我抗戰進入另一新階段，勝利愈近，而任務愈艱巨，故加強國防力量，聯合盟國，作進一步的努力，此實為最適當的時機。按諸各國法例，總動員的實施，或于非常時期準備戰爭，或于非常時期進行戰爭；我抗戰之初，一因事起倉卒，二因政治統一未久，三因戰事演變過劇，故既難于戰前準備實施總動員，亦苦于戰事進行中無從下手；今則戰局大定，操之自

我，人民亦漸習慣于戰時生活，故真正的戰爭，實可開始于今日，則今日總動員法的實施，宜乎最適合時機。第二、針對現實——目前的現實問題，非軍事無進展，亦非政治無進步，不可諱言的而是經濟上困難。故國家總動員法正是得財的損益，落重于經濟方面。總動員力量，俾得調集中心力量，予敵人以致命的打擊。第三、富于彈性——動員事項，千頭萬緒，凡所設施，應以實際之需要為準則；際此戰時，局勢瞬息萬變，欲配合每一時每一地的需要，良非易事，故動員立法，貴乎簡括，富于彈性，以留伸縮的餘地。

國家總動員法，雖僅廿二條，而內容中富于彈性者極多，如三四兩條列舉總動員物資與業務時，有「其他臨時指定之物資或業務」之規定，又如各條所稱「征用一部或全部」，「作適當之支配」，「加以限制或調整」等辦法，均可見其極富于彈性。

我們的抗戰，以及全世界的反侵略戰爭，能否早日獲得勝利，全視我們國家總動員法能否趕快徹底完成以爲斷。因此，實施國家總動員法，又必須同時履行幾個基本條件：第一、徹底完成國民精神動員——精神總動員，爲一切動員的實施條件，全國國民都應奉行精神動員綱領，信仰三民主義，實踐十

二條國民公約，遵守「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一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大目標，使全民精神，貞固不移，堅強不毀，而後總動員法，始能順利進行，及早完成。第二、厲行新生活運動——現在除了前說的民族鬥士之外，其餘的人，特別是囤積居奇的商人，與社會上有權勢的人，都非過戰時生活，距新生活運動的要求，不可以道里計。世界上任何國家，一到戰時，人民的衣食住行，必受政府的嚴格統制，幾無自由使用生活資料可言；反觀我們的國家，多少人在窮奢極侈，荒淫無度，作耗損國家物力的不當行為？是以厲行新生活，使全民一致隨同過艱苦的戰時生活，亦爲實行總動員法的先決條件。第三、加強黨團工作——中國國民黨是領導全國致力抗戰建國的唯一革命政黨，三民主義的青年團是領導青年的革命集團；黨員與團員同是黨軍中的革命鬥士，他們必須在黨軍中起示範作用，使民衆如水之就下，心悅誠服的參加建國工作，深切認識總動員法的重要性。

現在已到了必須拿出全民的戰國力，爭取最後勝利的時候，凡屬國民，唯有服從總裁，擁護政府，失其精忠，齊其勇，一致爲實行國家總動員法盡其最大的努力

(根森)

評

革 命 的 五 月

一年一度，我們呼着「革命的五月」。我們翻開日曆，在五月一層層湧動的熱潮！「五一」勞動紀念，「五三」濟南慘案，「五四」學生救國運動，「五五」國父就任非常總統，「五九」北洋軍閥賣國簽訂廿一條約國恥紀念，「五卅」上海南京路慘案。在我們中國，五月的日子是深透了的，血染紅了的；一直就激盪着中華民族解放運動的高潮，鼓勵我們前進，指示我們目標！

事實是有種種的不同，於是，有些人往往只把某一項事實強調起來，使它適應某種歪曲的觀念。其實我們正確的歸納起來，只有兩條大脈絡：第一、就是中華民族自求解放的革命洪流，浩浩蕩蕩的前進，在這前進的前途，最大的障礙是日本帝國主義者。「五卅」慘案；「五四」運動，「五九」國恥，「五卅」慘案；那一件不是暴露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那一件不是表現日本帝國主義者之

殘暴？那一件不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妄圖以武力遏阻中華民族革命運動所激起的高潮？第二、始終站在前頭正確領導中華民族革命運動的，就是中國國民黨。不必去敘述許多歷史，單就這五月，「五三」濟南慘案是國民革命軍直接與日本軍閥戰鬥的；「五四」是國民黨同志領導反對北洋軍閥賣國政府的；

「五五」是國父反對曹錕非法附選的賣國政府，故就任非常總統以重建革命基礎的；廿一條約是中國國民黨所誓死反對並宣告無效的；打倒帝國主義運動的高潮是中國國民黨所激動，並切實領導的。國父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總裁說：「三民主義是互為因果的，說中尤以民族主義為最重要。」國民革命之兩大目標，就是對內打倒軍閥，對外打倒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是我國軍閥所托生，亦是帝國主義的大頭，換言之，就是中華民族最大的敵人，國民革命最大的障礙。總之，「革命的五月」之種種事實，表明了一個真理，就是：「要完成中華民族革命，必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

領導這種運動的，就是中國國民黨！」

從上面的分析，可知我

們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早就開始了；然而，在這長久的時間，我們戰鬥的精神實在不銳。有些人渾渾噩噩，不知道戰鬥的存在，在那裡度紙醉金迷的生活；有些人精神上已被征服，「不入於揚則入於墨」；以為蘇聯才是他們真正的祖國；有些人態度超然，孤高自賞，以為自己就應該超於國家之上，在那裡「客觀地」品評一切，這才最有權威；有些人投機取巧，在政治上玩花樣，好言自為。這種國民的精神，多麼危險呀！

抗戰以後，自然我們戰鬥的精神是提高了，但是，還不夠。抗戰是一個「總解決」，要達到我們的目的，還要不斷地積極提高我們戰鬥的精神。這種精神基源於國民的國家和民族意識，基源於國民的「良心」；「革命的五月」的革命高潮，就是以這種精神為出發點的。我們必須記住這點，紀念「革命的五月」，更要反省一下：「忘了沒有？」

(依明)

論

懷念吳開先先生

一個不幸的消息：在上海的吳開先先生，我所認識的那位忠勇堅貞的吳開先先生，已於今年二月二十日被敵偽綁架而去了！他又被解到敵偽機關，「備受毒刑，死而復甦者再，誓不屈服」；這是中央社告訴我們的。（中央社重慶四月六日電）

這是誰的不幸？是吳先生個人的不幸？還是中華民族的不幸？在吳先生自己，實在無所謂幸和不幸，吳先生自己早已知道必有今日！這幾年來，吳先生在上海主持東南戰地的黨務，出入虎口，和強勢力搏鬥。敵偽方面懸賞巨款，要結果他的性命，欲得而甘心焉。而直到今日這樣的局勢之下，吳先生才有這樣的遭遇！這正足以見得我中華民族，雖在敵偽勢力瀰漫之中，也有正義的留存！而吳先生那種忠勇堅貞的性格，又大大的激勵了那些身處險境的同胞，遂使敵偽的魔手，一時近身他不得！

十幾年前，我在上海已經認識了吳先生，並且早已欽敬他的忠實和正直。不過我那時爲了教書忙，著述忙，很少和他有接觸的機會。直到二十九年春間，吳先生有一次因

公離開上海，要飛往重慶，經過了香港；恰好我也走說那惡劣的環境，到了香港。吳先生就四處來尋訪，約我和他接談。在那次接談當中，我對於吳先生的印象最深。他對我那時的行動，表示欣悅，而自以爲他本人的工作，似乎有未盡未完之處却深深的悔恨。他對那些困居險境的人們，還未曾設法營救出來，很誠懇的表示歡意和惋惜。後來吳先生又二次來信慰問，不過待我要寫回信的時候，他又返歸上海公幹去了。

吳先生只知道空護同胞，只知道自己的責任所在，只顧到了眼目前一般同胞的痛苦，因之他把個人的安危和生死，完全置諸度外，看着崎嶇的險路，好像平坦大道，赴湯蹈火而不辭。我悟到了古來聖賢之所以能成仁成義，正是由於他們對人生觀的透徹！我瞭解了「知其不可而爲之」這句話的意義！

「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有許多平，平日高談革命，到了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是否能與吳先生這種堅貞不拔的氣概？我們應該深深的自省一下！吳先生曾在上海的任務

和工作，其艱險和重要，正不下於當時苦守四行倉庫的八百孤軍！我們很幸運的，看到目前的中華民族，不但是在前線浴血苦鬥的戰士裏，即在黨政界的同志當中，也有不少像張曉陽一流的人物！吳先生確實是足以給目前中國一般文臣們吐一口氣，在黨國和抗建更上也增進了無限的光輝。

以敵偽那毒手段的狠毒，和目前真確消息的難得，此際的吳先生究竟是尚否在人間？我撰作此文之頃，究竟對吳先生是生前的懷念？還是死後的追悼？我却以爲這些都可以不必置問！吳先生將如顏真卿般殉難而死，或如武持節歸漢？這些對他個人的幸和不幸，我們儘可不必掛在心上！因爲懷吳先生這種忠勇堅貞的人格，落到了敵偽的手裏，給我們親炙一下，正可以使敵人親切的覺察我們中華民族的終究不可欺，終究不可侮！所以無論敵偽怎樣的處置吳先生，他的任務和工作是始終存在的！敵偽此際固然可以殘害吳先生的身體，甚至給它消滅，却不能毀損吳先生的精神和作用於末末！吳先生已盡了他的責任，他的安危存亡，現在和他的使命毫無多大關係了。問題却在我們能否爲吳先生的化身？能否依濟而作接續的精神，來秉承他那種忠勇堅貞的氣概？我們懷念吳先生的，只有自省，只有自奮！

太平洋戰爭決定在 海軍

太平洋戰爭未發生前，世人有許多樂觀的因素；現在又似乎表示

頗，而美國能達二千五百萬噸，相差五十倍。這才是日本的致命傷。

從上面的觀察，我們以為日本在馬來亞、新加坡、菲律賓，以至於在緬甸的勝利，是不甚重要的。因為只要有一天同盟國把日本的海軍擊潰了，截斷海上的補給線，那麼它在南太平洋各島以及在越南泰國緬甸的侵略軍隊，除了束手待斃之外，只有談海自殺了。二月間馬加撒海戰，和這次珊瑚海上之海戰，都證明了日本海軍作戰力量的薄弱。假如再經過像一兩次的損失，日本海軍只有退到暹羅灣和東京灣一帶採取守勢，以備從那邊撤兵了。同盟國不久殆將採取海上攻勢，以割斷侵略者伸出三千里外的觸鬚的。

焦灼憂慮。這自然是過於容易接受現實的刺激的緣故。

日間依照「美日必戰論」者炫耀勝利的計劃，對夏威夷，菲律賓，和荷屬東印度成功，使戰局得到意外的發展，這是最值得我們注意的。但是，我們對於這點應該從兩方面去觀察：第一，戰術的成功可以改變戰局。日本對英美突襲，是徹底的戰術成功，反過來說，英美也未嘗不可以對日本來一個海

空突襲，那時也可以改變戰局。第二，日本的資源和生產能力趕不上英美，英美的損失補充易，日本的損失補充難。在這種情況下，英美必能於短期間內補充其在夏威夷，菲律賓和新加坡的損失，恢復優勢，實行反攻。

論家會說：「太平洋戰爭決定在空軍」，這是在戰事爆發動說的話。

因此，我以為決定太平洋戰爭的主要因素還是海軍，空軍不過是海軍重要的補助力罷了。空軍固然可以炸沉艦隻，可以驅散海軍的隊形，它對於海戰的幫助是非常大的；但，畢竟不能代替海軍的任務。如保護海上交通，維持海軍補給線，與海軍決戰等，都不是空軍所能担任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本雖然不斷的佔着勝利，但它的海軍的損失將使日國感着最大的困難。五百艘艦艇中，已損失五分之一，連同船隻的損失，最少需要兩年來補充，而真正大規模的海戰還在後頭！「太平洋戰爭決定在海軍」！明白了這點，我們對於現戰局實在用不着焦慮，祇要同盟國能有統一的指揮，而採取機敏的行動，一旦爭取主動，實行反攻，便可知日本的「勝利」亦不過「曇花一現」而已。（依明）

他的說法有許多重要的理由：如日本空軍的質素低，美國空軍的質素高；日本缺乏汽油，美國不缺；日本每月只能生產五百至七百架飛機，美國生產二千至五千架。空軍對於海軍的威力是日益明顯了，所以決定勝負的因素在空軍，而勝利必然屬於美國及其盟國這一方。

因此，我以為決定太平洋戰爭的主要因素還是海軍，空軍不過是海軍重要的補助力罷了。空軍固然可以炸沉艦隻，可以驅散海軍的隊形，它對於海戰的幫助是非常大的；但，畢竟不能代替海軍的任務。如保護海上交通，維持海軍補給線，與海軍決戰等，都不是空軍所能担任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本雖然不斷的佔着勝利，但它的海軍的損失將使日國感着最大的困難。五百艘艦艇中，已損失五分之一，連同船隻的損失，最少需要兩年來補充，而真正大規模的海戰還在後頭！「太平洋戰爭決定在海軍」！明白了這點，我們對於現戰局實在用不着焦慮，祇要同盟國能有統一的指揮，而採取機敏的行動，一旦爭取主動，實行反攻，便可知日本的「勝利」亦不過「曇花一現」而已。（依明）

海軍戰爭，海軍當然還是主力。就海軍來說，日本固然於一九三七年宣告廢棄華盛頓海軍條約，暗中建造四萬五千噸的龍級戰鬥艦，並擴充其他艦隻，達到了五與三、五的比率。但，日本的造船力每年只有五十萬

不是空軍所能担任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日本雖然不斷的佔着勝利，但它的海軍的損失將使日國感着最大的困難。五百艘艦艇中，已損失五分之一，連同船隻的損失，最少需要兩年來補充，而真正大規模的海戰還在後頭！「太平洋戰爭決定在海軍」！明白了這點，我們對於現戰局實在用不着焦慮，祇要同盟國能有統一的指揮，而採取機敏的行動，一旦爭取主動，實行反攻，便可知日本的「勝利」亦不過「曇花一現」而已。（依明）

專 載

科學研究之意見

朱家驊

在中華自然科學社第十四屆年會講——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

諸位先生：

今天貴社舉行第十四屆年會，兄弟承邀參加，十分榮幸。貴社社員都是我國自然科學界的專家，歷年以來，在學術方面和事業方面，都有很好的成績表現，對國家民族貢獻更大，這是兄弟至為欽佩的。貴社社務，年來有長足的進展，這大年會，一定有許多寶貴的報告，提案，和論文發表，為我國學術界放一異彩。今天兄弟把個人對於我國自然科學界的一些感想和小小希望，約略說說。

從前治學的人，所涉範圍甚廣，大抵都博學精通，文學家，史學家，哲學家，往往兼通天文，地理，或物類；醫學家，數學家，亦往往同時是哲學家，文學家。好比孔子施教，以禮樂射御書數並舉，其論詩，也說「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可見孔子不僅是大哲學家，同時對數學，博物，也注意研究。周秦諸子的著述裡面，也有許多關於自然科學的道理。司馬遷、班固這些史學家，張衡、張華等一般文學家，都有關於天文地理的發明或著述。在歐洲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等，以至近代的培根笛卡兒，來布尼茲，羅素等，都是哲學家兼科學家。其餘兼通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更不勝枚舉。近百年來，科學進步異常迅速，因為人的精力和時間，都有限度，要想對某一現象作深遠的研究，其範圍自然不能過於廣泛，所以科學愈發達研究愈精深，各人研究的範圍亦愈縮小，因此現在一般的學者大都沒有古人那樣博覽旁通了。固然這也是自然的趨勢，但除了自己所研究的事物以外，同時仍須注意到其他部門，尤其從社會整個的立場來看，各種科學必須平衡發展，顧及相互關係，不應忽視別部份，以致影響學術全面的進步。好比十多年前我國一

般風氣，對社會科學的興趣，比較自然科學來得濃厚，各大學招生文法商等學院投考的異常繁多，而理農工醫等學院即寥若晨星，結果畢業生在文法商方面人浮於事，許多人找不到職業，而在理農工醫方面，則事浮於人，許多事沒有人去做，各種事業因此也不易發達。前幾年因政府當局及社會人士極力提倡自然科學，才把風氣轉變過來，現在學習自然科學的已漸漸多起來了，事業亦逐漸增多了，這可說是一種好的現象。不過在自然科學裡面還有一種不平衡的傾向，就是學習應用方面的特別多，而學習純粹理論的太少。固然應用科學的效用較大，在這抗戰時期需要這方面的人才尤其較多，但是求真知真理的提倡也一樣不容我們忽視。我們知道純粹理論科學是人類文明的基礎，更是一切應用科學的根本，應用科學離開了純粹理論科學，就不能發揚光大，就是在規模較大的工廠和場所當中，也都有一部份專做理論的研究工作。純粹理論科學的研究，雖不注重實用，而只在探求真知真理，然結果都有應用的價值。例如研究人類學的人往往去量死人的骨頭，這似乎沒有應用的價值，並且會使一般人感覺到奇怪；但今春翁詠寬先生談起，經濟部有一個荷蘭水利顧問蒲特來 (F. J. M. Bourdies) 去年到雲南金沙江上工作，途中遇險，死於急流之中，過了許久，才等到了他不完整的屍體，但當時面貌已經模糊，無從確實證明，我們都知道他是由國聯聘請來的，國聯為他保了十幾萬佛朗的生命險，倘無確實證明，那末他的家屬就不能領到保險費，經濟部為此事煞費苦心，後來終於請了中央研究院的人類學專家吳定良先生前往出事地點會同保險公司派來的人，量這個屍體的骨頭，結果證明這副骨頭是北歐

人體的。於是保險公司便承認個屍體，而照數賠償了全部保險費，由此更可知一切理論的研究不是沒有用處，連這種骨頭的工作，也有實際應用的價值。當然，我們不是要自然科學界的人都研究純粹理論，而不及其他方面，當然我們隨時都希望國科學之用，社會得科學之益可使事業方面和社會人士對科學有深確的瞭解，同時益增其對於科學之信心，蓋如此也，而後科學始有轉於實際之建設，而促成科學本身得在中國真正昌明，不過在這高唱實用太過的時候，希望大家不要忽略這些純粹理論科學。致失平衡的發展。近年來一般青年的心理多以爲從事應用方面將來出路較好，而從事專求真知真理的純粹研究，將來出路較窄，於是棄此就彼，把學術看作單純的謀生手段，完全失掉了爲學術而研究的良好風氣，這實在是我國學術界的一個危險現象。我們固然不能，也不必希望國人全都成爲專門的學者，但是在科學發達的今日我們如果沒有能以身學術學生致力研究的真正學者，則不但學術之在中國無發展之望，即國家亦安能生存！本來治學的人是不好講求名利的，須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再守之以恆，持之以久，朝斯夕斯，終身不倦，方能有所成就，古人都是這樣，絕對不把學術與金錢名位混爲一談，尤其在我們中國，向來如此。真正治學的，不但不屑拿學術做獵取名利的工作，就是著述等身，也多不願在生前發表，正如史公所謂「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好比明末的王夫之先生，處於亡國之痛，幾次想起兵恢復，失敗以後，隱居衡陽的石船山，專心研究學問，據說他的書藏在樓上，曾有幾十年未下樓，對於經史子集，無所不讀，且多獨到的見解。他的著述共有數百種，真是豐富極了，但生前沒有一種付印，死後六十多年，才有人替他印了一部分，直到近年，方有一百幾十冊的船山遺書出現，說不定還遺缺了一部分呢！由此可見他專心研究學術的精神，不特沒有名利的念頭，就是他的著作，是否能傳之後世，有沒有人鑒賞，他也全不在意。這不祇王夫之先生一人如此，自來真正的學者，莫不皆然。昨天戴季陶先生在太戈爾先生追悼會中，講到太戈爾先生所創辦的國際大學內有位教授編撰孟加拉詞典，三十五年不離大

學一步；他在印度，還看到一個學習聖書的人也有同樣的毅力。那天在有名的阿海陀（Ajitha）山湖裏聖書占壁畫工作了三十年。關於於斯，未曾聞斷，並且沒有出洞一次。這種精神何等偉大！求知要誰這深，自然無事不成。所以兄弟很希望全國學術界大家起來，提倡爲學術而研究的作風，尤其對於研究純粹理論科學的學者，更加以尊重與協助，俾能孜孜不倦，終身從事，庶幾可以提高我國現代學術的水準，奠定我國學術的基礎，想來精位對此也必有同感。其次，自然科學是以自然現象爲對象，所以要在自然界裏實習；一個研究自然科學的人，也不能專在屋內工作，應該與大自然經常接觸。過去我國一般研究自然科學的人，不免有些偏重資本和室內工作對於自然界的認識，終感不足，在應用科學方面，也是如此。很多事雖然閱讀了高深的書籍，但有時缺乏實際的經驗，到真要應用的時候，就感到困難，這是因爲忽略實習，或實習太少的原故。例如從前有些醫學院，竟沒有醫院，工學院沒有工廠，農學院沒有農場林牧場，即使有的，也是規模很小，不敷實習之用，學生除了上課以外，要想到醫院診病到工廠開機器，或到農場種地，祇有偶然跟數員出去幾次，真正實地工作的機會，實在太少。所以不容易做到得心應手。但是應用方面，不動手是不行的，在學的時候，最重要的是要理論和實際並重，不可偏廢。過去因爲交通不便的緣故，專家學者不容易到西北西南從事研究，每列爲憾事，現在有許多高等教育文化機關遷移到西北西南，正好是一個實地研究的機會，並且在此抗戰期間對於圖書儀器設備之添置，有種種不便，以致室內研究工作時不免感覺困難。所以更應多做野外工作，利用各種自然現象，以補設備之不足。向來學者對於西北西南的許多實際材料，往往感覺缺乏，現在却比較容易得到，而且從前所不能聽到的，如今已可以親身看到。還有各種調查，探測，考察工作，也都得到了不少的便利，這於自然科學的研究，確有很大的幫助。大家如能利用這種機會，多作實地的研究，所收的效果，一定非常的良好，還不僅在研究方面可獲得實際的材料，而且對於國計民生，也必有極大的貢獻。所以兄弟認爲這種野外工作，非常重要，希望全國學術界儘量利用，積極提倡，養成這種風氣。

兄弟今天再加這個機會，目的是來聽各位的條論，自己並沒有什麼好的意思貢獻。今後各位在研究方面，如有需要與中央研究院合作，或個人盡力的地方，兄弟無不樂爲，兄弟有須請教各位的，也希望各位隨時多多協助。

著 論

大學青年的政治素養問題

蕭 宜 芬

一、引言

十六年前我是一個大學生，而且是熱烈參加政治運動的一員；十六年以來，我是僅以一大學畢業生的資格，投身社會。從在學時種種之理想，熱情；到投身社會所見的矛盾，所受的磨折，我都是身歷其境。現在想將我的經驗，以客觀的態度，坦率誠懇的寫出來，和現在在學的同學研究。立意是拋磚引玉，使大學生對於政治素養問題有等概括的共同的概念，這是我寫本文的一點意思。

二、歷史賦予我們的

責任

人類是政治的動物，人類能謀集團生活後，就有政治的意識，政治的規範。及至現代，沒有一個人能脫離政治的關係而生活，再沒有所謂無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所以，我們再不能誤解政治就是做官人的事，更

不能誤解從事政治活動就是寫着做官。我們要了解政治與我們切身的生活有關係，與全體國民的生活有關係，與我們後世子孫的生活有關係，與我們國家民族生存和發展有關係。總之，我們切不能把政治生活看作解決個人生活的一種職業，因為政治有歷史的意義，是迎接着歷史而繼往開來的一種集體的生活活動的反映。

人類早就已歷着一種最高的生活理想，那就是公平無私的大同世界。如我國老子的「小國寡民」，柏拉圖的「理想國」，都是這種理想的境界。禮運大同篇所述，便表示孔子追慕這種理想。我們看社會進化史，可知人類社會的進化，確有各個不同的階段，但都是朝着這個極終的目標前進；歷史上經過無數的鬥爭，極大的流血，到今看來，都是為此理想而犧牲奮鬥。但是，如何達成這種理想，就是如何從理論的指導和制度的配合上完成大同世界的境界呢？有史以來，沒有比國父的三民主義政治更為完善與切實的了。所以，三民主義不單是救國主義，

而且是真實的救世主義。

我國古語說：「時勢造英雄」，又說：「英雄造時勢」。這兩句話的爭辯很多。勿論其如何，是完全表明了人和歷史的密切關係。任何人不能離開歷史的關係，任何人須負擔推動歷史進化的責任，任何人也有創造歷史的能力。一個人離開了人羣的關係，如魯濱孫一樣，獨自一人漂一孤島，便沒有所謂歷史，反之，任何人投生到人羣社會，他便得接受歷史所賦予的責任，合力推動的進化之輪。所以，我們從現在來看過去的歷史，固然好像影畫一樣，可以把它分別為一片一片，解剖為一塊一塊；但，我們若把歷史聯成一個整體來看，它是活的，有生命的，一天一天在長成，發展，進化的。這種「活」的，「動」的，「進化」的力量，都是古往今來，無數人羣所供獻的「生之活力」，「生之衝動」所積聚而成，而且一代一代的供獻着，絕無間息，如接力賽一樣，去推動歷史進化的巨輪。比方說，蒸氣機械的發明，就已經把歷史一下推進了若干世紀。蒸汽

和機械固然是物質，而發明這蒸氣機械的是有智慧的「人」，用這蒸氣機械的也是有智慧的「人」。人類總想把社會生活的環境，弄成理想的境界，這是歷史進化的原動力。

自古以來，立志救國救世的偉人，必然看重青年，和殷切期望青年的，因為眼見青年是要接受前一代人所交下來的推動歷史進化的責任的。他們偉大的事業和希望，都要付託給青年來繼續完成。所以，一切讚美青年的話，都是真實的；但青年決不能因此驕傲，而正更因人們的讚美和希望而覺悟到本身責任之重大，更加謹慎奮發去盡盡本身的責任，完成歷史的使命。

大學青年的責任當然更加重大了！這是很明白的。因為大學畢業的青年，最低限度是居於社會領導的地位的。換句話說，大學青年對於推動歷史進化，比一般不知不覺的民衆負更大的責任，更大的力量。

我國現正處於歷史的最大變革的時代，我們簡直就是和歷史鬥爭——和歷史最惡劣的環境鬥爭，和歷史最腐敗的傳統鬥爭！這就是歷史所賦予我們的任務，這種任務是非常偉大與艱巨的。這種鬥爭，不僅關係我們國家民族的本身，我們更要想想：中國的盛衰對於世界將作何影響？

三、剷除官僚主義與確

立革命的人生觀

(一) 官僚主義政治是我們歷史上最

的敵人，我們要與歷史鬥爭，首先就應該剷除官僚主義。

我國官僚制度形成，是有久遠歷史的，在封建制度破滅之後，商業資本形成時期，便建立了官僚制度。官僚制度的性質，就是政治職業化，更明白說，就是政治商業化。這本來是商業資本形成之後，商業資本家打倒封建主的一種過程，在當時不足為奇的；然而，後來的流弊則極大。

第一、官僚政治在意識上由於封建傳統，分治者與被治者，治者與被治者的關係是奴主關係，從這一意識出發，產生種種不良的觀念，如：(一) 視貪污剝削為統治階級應有的利益。(二) 政治設施以狹窄觀念為出發點。(三) 政治地位之不平等等。

(四) 以作官為牟利之捷徑。(五) 以作官為職業，缺乏國家觀念。第二、官僚政治是形式政治，換句話說，就是非科學的政治。結果行政效率低微，而政治實際的責任又不

分明。所以，根本就談不上建設。敷衍塞責，巧於應付者，便是「中士」或「紳士」去負責。第三、官僚政治是惰性的政治。由於政治意識之愚劣，和政治方法與技能之低下，所以，官僚政治沒有一點積極性，建設性，而成為惰性的政治。一切因循成規，不知改進；對於民衆福利更置諸腦後，而惟奔競鑽營，逢迎巴結，保持職位是務。

大多數的青年富有愛國熱情，知道官僚主義對我國民族之為害，而強烈的反對官

僚政治；但是，有許多人無形中就跟著官僚主義走，做了官僚主義的征服者。我們試放眼觀看，現在政治各階層，不都是青年幹部嗎？他們不都是曾受初中高中大學教育的新青年嗎？然而，無論上級如何鞭策鼓勵，努力訓練，甚至嚴刑峻法以繩，而政治的惡習總不易革除，政治的進步總不如我們的理想。這是什麼道理？就是青年的認識不足，意志不堅，修養不毅，意識上成為官僚主義的俘虜，這是我們青年自己應該慚愧自省則。在校時高談闊論，痛罵官僚，一投身到政治，自己便成為官僚；就是因為在校時缺乏深刻的政治培養，這是青年最大的毛病。

因此，我以為剷除官僚主義，第一須從青年本身做起，青年每個人能立志自己不做官僚，不做官僚主義的俘虜，最低限度十年之後中國沒有官僚主義的形影了。國父對青年的遺訓，是勸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他說：

現在的青年，便應該以救國家為己任，把建設將來社會事業的責任負担起來。……古今人之名望的高大，不是在他所做的官大，是在他所做的事業成功，如果一件事業能够成功，便能享大名，所以，勸諸君立志，是要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又說：

學生立志，注意之點萬不可想達到甚麼地位，必須要做成一件甚麼事。因為地位是關係個人的，達到了什麼地位。只能為個人謀幸福；事業是關係羣衆的，

做成了什麼事，便請為大家謀幸福。

門，貫徹到底。這般願乎個人對於政治哲學

宇宙的本體是「無」，宇宙萬物有生有之

他對黨員的訓示，則更加嚴厲：
做黨員的精神，就是能够為主義去犧牲，大家為黨做事，事無大小，必須持以毅力，澈底成功。平日立志，應該想做大事，不可想做做大官；如果存心做大官，便失去黨員的眞精神。

和人生哲學的認識，方有堅定的信仰，高貴的人格。關於政治哲學的問題，習且不談，關於人生哲學的問題，願略為一說。因為這

是「無私」，同時，因為無私，才能偉大永

他指斥「許多黨員，總是想做大官，如果得志，做了大官，便心滿意足。若不得志的，不能做大官，便反對本黨，去贊成敵黨。

我們一般同事、同志、學生、官長，要做一個革命家，做一個三民主義實行家

起自私心來，不給我們太陽光，那麼大家一齊完結。宇宙間的生存是互助互助，自然排

至於熱心黨務，真正為本黨主義去奮鬥的，固然是很少的，但大多數黨員，都是以加入本黨為做官的終南捷徑。」他認為這是建國不能迅速成功的最大障礙，所以在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淘汰那些不良份子。

做一個革命家，做一個三民主義實行家，做一個總理的信從，一定要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怕困難，不避危險，不苟且，不偷安，信仰主義，始終不變；非有一個確定的人生觀不行！要確定人生觀，就要有哲學的基礎。

自然的意義。老子說：

上節所引 國父的遺訓，是他反對官僚主義強烈的表示。我們接受 國父的教訓，反對官僚主義，就要自己立志不做官做，自己要有這種認識和素養。大家也不要誤會，以為凡是做了官便是做官，那麼政務就沒有

我們要確立的人生觀，自然就是革命的人生觀。所謂革命的人生觀，概括的說，就是無私的，救世的，創造的利他的人生觀。

則。簡單的說，就是法自然之無私，以輔萬物之自然。 總裁說：「自然之理即是生存，反之即是死亡。」生存的基本精神在於無私。老子的思想，很多人說他滑極無為，我以為誤會太深。是的，老子的政治思想是「無為」，其實「無為」二字不好看得太呆板，以為「無為」便甚甚都不去做，聽其自然；「無為」實係「無為己」之意，就是

事不可立志做大官」，這就是說要認明做官是一種救國救民的一種大事業，而不應做為個人升官發財窮國害民的官僚。我們人人有這種覺悟，人人有這種志向，官僚主義自然被剷除了。

這理我們應該明白的有兩點：第一、就是生命本質之無私；第二、就是生命之偉大，在於它無私本質之自然開展，而產生救世的，創造的，服務的利他的種種美滿結果。

論運篇「貧賤其乘於地也不必辭讓已，力服其不出於身也不功而已」的意思。所以他說「為而不有」，「功成而不居。」又說：「天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者人之心也，無者道之體也；既然是有，當知本無。從有看，便有私；從無看，則無私。老子的思

被剷除了。

關於第一點，我們知道，最親切而自私的就是「我」。我們要研究「我之究竟」，「人生之究竟」，生命的本質，宇宙的本體。

把個人生命合在宇宙萬物生命之中，從宇宙萬物生命合在宇宙萬物生命之中，從宇宙

的，我們要剷除官僚主義，必須有深刻的認識，堅定的素養，然後才能艱苦不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犧牲奮

本體，發現生命的本質；從生命的本質，以知「我」之究竟，而定個人安身立命之道。

地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有者人之心也，無者道之體也；既然是有，當知本無。從有看，便有私；從無看，則無私。老子的思

想便是與人從無看。因為能從無看，則有用更爲你大長久；若死證有這一面，則有用便得於偏狹渺小。所以說：「反其道之動，調者道之用」，人類當知反「無」，以節物慾「有」之情。

關於第二點，總我有一篇「黨員的人生觀」的訓示說：

我們做人，若沒有一個確定的人生觀，就不知做人的道理，將來就沒有良好的結果，一生一世，就做一個不明不白的人。我們革命黨員，第一要知道我們爲什麼要做人，知道怎樣來做人？不知道這一點，做事便得不到好處。

他對人生的意義，解釋得很明白：

所謂人生，最要緊的，就是生字；這個生字，含有兩個意義：一曰生活，一曰生命。……生活的目的，就是增進我們人類全體的生活……；生命的意義，是創造我們將來繼續的生命。

總括起來成爲一副復工的對聯：「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這就是革命的人生觀之總括的說明。我們如果知道「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一切的生活活動，生活手段，都能以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爲目的，那麼，它的結果必然是「利他的」，「服務的」。再，我們如果「解「生命的意義在創造繼起之生命」，則對於自己的生命不至如此自私，如此寶貴，而能被其創造的意義，救世的精神。所以，革命的

人生觀，必然要對生命的偉大價值，生活的真正意義，能够參透透，看得醒。

我們應該承認，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救世的思想。所以革命的人生觀，就是救世的人生觀。國父說：「革命的學問，就是救國救民的學問。」救世是積極的，把個人的生命伸展開來，合上全體的生命犧牲小我，以完成大我。這正如 總我說：

革命不是爲個人，乃爲增進全體人類之幸福。所以生活之真正目的，可以說不是爲個人求自由平等幸福，並且要犧牲個人的自由平等和幸福，以求全體人類之自由平等和幸福。

革命的人生觀，固然是救世的人生觀；同時，也必然是創造的人生，服務的利他的。所謂「創造」，究其實，是「有益人羣」之意，非有益人羣，將不成爲創造。我們在前而說過，人類是藉着一個共同的理想的目的而前進的，這個目的就是全體人類共存共榮的大同世界。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必須集合全體人類智慧，以克服自然和和人的種種困難，因此，凡有益於人類進化內事業，我們才能承認其爲創造。比方說，爾現在有一種良好發明，但是，爾把它隱藏起來，獨自享受，這就不成其爲創造了。革命的必然是創造的，是有從屬性的，因爲革命是爲人羣幸福，不是爲個人幸福的。創造的人生，必然要有服務的，利他的精神，有「爲而不有」的態度。國父曾告訴我們：

人生應以服務爲目的，不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的人，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人之福；至於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

如果一個人有革命的認識和信仰，那麼他的結果必然是這樣的。最低限度，雖是無聰明才力者，他亦當做一個時代的好國民，能够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而不至爲革命之障礙。

我輩韓非對公私的定義說得很好：「自環爲私，背私爲公。」爲公衆，公理，要公道，公平。一個人的生命，最多也不過百歲，而人類的生存是要求永久不滅的。一個人的能力也實在有限，「一人之事，爲工以爲備。」所以，個人的生命和能力實在都渺小。若果把自己始終結縛在還自私渺小的境界，則不能將人生的偉大處表現出來，不能將生命的真價值展開出來的。革命的人生，就是要把生命伸展開來，合上人類全體生命之洪流，不啻晝夜的前進，視人類全體生命爲整體，發揮生之衝動，表現生之進化，以求個人生命之得遂，全體生命之永存，這樣才能成就生命的偉大。老子說：「公乃大，大乃久」，便是個意思。「大」，便是「生命之自然開展」的意思。

四、認識時代環境

上面我們討論了青年對於歷史所負的責任，和獨立革命的人生觀兩個問題；現在我們要討論的，就是我們生在這個時代的中國，應該如何適應歷史所賦予我們的責任、如何發揮革命的人格與力量，才能完成歷史的使命？

第一，我們唯一的任務就是救中國，而且必要用革命的精神，革命的主義才能救中國。這是歷史所賦予我們的責任，國家所賦予我們的義務，時代所賦予我們的權利。我們可以分開幾點來說：（一）救中國也就是救世界。我國文化，就是救世文化。在二千餘年前，我們的先哲就創立大同思想，民胞物與。這種思想不分國界，不分種界，完全以全人類和平的生存發展為着眼點。我國古代的大同思想固然可貴，而其實行的方法尤為可貴。因為我國的救世思想，完全反對武力的征服主義，而採取平等博愛的精神，應用和平自覺的方法。如傳教一般，注重改革人心，誘導善性。如大學第一章所說，就是敬啟「明明德」，「親民」，到「止於至善」，以達到「治國」，「平天下」的大同世界。所以，它的政治方法，還是從個人改造着手，從改造的個人，到改造的世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平天下」到「天下平」，便是大同世界。它的基本精神是「和平」，實行方法是「仁愛」。社會基礎是「有德必有信」。這種思想，是最完備精微的救世思想，可憐濟渡了幾千年，我們應該相信，這是良善的救世思想，所以，中國之勝利就是世界之勝利，中國之得救也就是世界之得救。（二）要救世界必須先救中國。中國小單有精深博大的救世思想，而具有救世最偉大的力量與責任。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這是誰都知道的。在鴉片戰爭之前，外人尚視中國為龐然大物，足以左右世界；其實，到現在我們仍然沒有安定世界的地位與力量，這是不可否認的。日開因為無視我國這種地位與力量，暴戾恣睢，瘋狂侵略，必然自召覆滅，這是一定的道理。祇要我們全民的悟和團結，世界的巨人站了起來，自然長安定世界的重心。所以，要救世界，必先救中國；要達到世界大同的理想，必須先建設三民主義之新中國。（三）我國在世界上所佔的地位固如是其重要，而在時代所處之環境又如此其危險，所以，我們推動歷史巨輪過程中，在這一時代唯一的任務，就是救中國。救國也就完成了歷史所賦予我們的責任，救國也就完成了我們革命的人格。這時代，離開了國家民族的立場沒有革命，離開了國家民族的立場也沒有人格。國家無論如何總是我們現代社會生活的最高形態，民族無論如何總是我們現

代社會的最高集團，連高唱「工人無祖國」的蘇聯，也不能超過這個界限。所以，國父說：「必先實行民族主義，然後才配得上談世界主義」。如現在竟有些人丟開自己的國家民族，甚且不同的推戴自己國家的國父，認為蘇聯才是他們的祖國，共產黨才是他們的兄弟；這種思想是不反時代，反革命，反人格的，我想就蘇聯也不是這種不肖的子孫。

第二，實行三民主義救中國。國父演講三民主義，開宗明義便說：「三民主義就是救國主義」；他猶留時低聲的呼籲：「和平奮鬥救中國」；他的遺囑首先說明他領導的國民革命，「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他鼓明的主義，學生的事業，都是為救中國；中國國民黨奉行的主義，繼承他的遺志，亦是為救中國。這就因為歷史賦予我們的使命是救中國，而中國所處的時代環境，唯有實行三民主義才能真救中國，徹底救中國，才能把中國從根救起，在世界上永久立於不敗的，領導的地位，完成我們人類歷史進程中最艱巨偉大的使命！反過來說，除了三民主義，沒有那一種主義能救中國；除了三民主義，其他的主義都是害中國，甚至亡中國的。這就是因為三民主義的偉大處。 總裁說：

總理的主義，是淵源於中國固有的政治與倫理哲學的孔教思想，而同時參酌中國現代的國情，攝取歐美社會科學和政

治制度的精華，再加以「總理他自己獨自見到的原理所證諸的思想體系。其博大精深，真正可以說「推之世界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真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古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就這一整來說，我們應該承認我國傳統的政治與倫理哲學思想，它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賴以生存發展的基本精神。而且歷史上證明了這種精神的衰微，也就是中華民族的衰微；這種精神的興隆，也就是中華民族的興隆。這種精神是什麼？就是以天地好生之德之「民生哲學」為出發點，以天下為公之大同世界為目標，以和平仁愛為方法，以忠孝信義修身齊家為基礎；從改造個人以至改造社會國家世界，澈頭澈尾，一貫貫徹。我們的社會是人的社會，我們的政治是人的政治，我們的關係也是人與人的關係，所以，我們要注視這永久不滅的現實，從而發現永久不滅的真理。我國古代的政治哲學思想，對於這點有大發現，就是一個「仁」字。個人的修身要「仁」，人與人的關係要「仁」，國與國的關係也要「仁」；社會的基礎是「仁」，政治的基礎也是「仁」。「仁」是什麼？「仁者二人」，「仁者相人偶也」，換句話說，「

仁」應包括三類基本意義：（一）就是人類平等的精神，（二）就是人類同類的意識，（三）人類生命之「生之衝動」。不則公，同類則愛，生則永久。人類的進化，必然循着這個軌道。我們如果背棄了這種精神不惟無法救人救世，而且根本無法自救，而將陷於不拔的深淵。國父曾濤第三國際代表馬林說：「中國有一個道統，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繼不絕；我的思想基礎，就是這個道統，我的革命，就是繼承這個正統思想來發揚光大」。唯其三民主義思想是繼承這個道統而來，這便是三民主義的偉大處，也便是唯有三民主義才能真正的，澈底的救中國的道理。

再從後一點來說，現在世界上除三民主義之外，還有三種主義在那裏門爭着，就是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它們都是想用某一種主義來解決民族民生諸問題，而它們的出發點，則又是偏重於某一方面。其實這確是愚笨笨的辦法，它們的哲學基礎實在够不上我國的偉大，所以不能產生三民主義這樣精深的救世思想。近年以來，我們對於資本主義的民主主義，馬克斯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它們的弊病已看得得透徹了。它們的弊病之所在，就是偏於一隅，而不能普週平允；這都是時代潮流

一時所激發，故難持久不散，不能「推之四海而皆準，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的。它們本身必須修正，而且必須依照三民主義平等普遍的精神來修正的。三民主義對於上面三種主義的缺點固已予修正，同時三民主義又加以總合的調和，取精攝華，而成為救國救民救濟世界人類之至寶。總裁對於上面三種主義與三民主義之比較指示得極明白：

現在世界各國政黨所揭舉的主義，最主要是小外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而已。今日所謂民主主義，本為資本主義國家之產物，歷史環境已經變遷，決不能如三民主義之民權主義之澈底，現在世界各國政黨所揭舉的主義，最主要的是民主主義，共產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其實這三種主義皆有缺點而且他們的內容很不充備：譬如共產主義固是重視經濟，近於民生主義，却不重視民族和民權主義，而且共產黨人領導民生，亦只重視一個階級的利益，而不兼顧全民的利益。法西斯主義注重民族主義，却不重視民權和民生主義，而且法西斯主義者的民族主義，又只注重自己民族的利益，忽視其他民族的利益。至於領導民主主義的政黨，就一般國家而言，他雖然注重民權，而以全民利

益與克己。但實際上資本主義的氣味太重，不能給民生問題以完滿的解決，而且現在所謂民主主義，對於選舉方法極不公平，不能算是真正的民權主義。所以，這些政黨都可說是偏而不全。惟有我們，總理所創造的三民主義則不然；它以「公」字為出發點，所以能涵蓋一切，把各方面皆行均衡顧到，絲無偏頗之弊。

我們試想，我們國父子創這權精深博大，救世救民救濟世界人類的三民主義，我們若不去力行，不去闡揚，反有許多失去自信心自尊心的奴性主義者，以崇拜西洋舶來品為榮，高談馬克思主義，以為這才是前進，才是學問，豈不令人笑話？

末了，我想借 總裁於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立二週年告全國青年書中說一段話，作為本文的結論：

夫人生之所可貴，即在對前途有瞻望，對行爲有意志，而對生活有理想，此爲人類之特性，而在青年時期爲尤然。若人所生之時代，爲如何之時代？在此時代中，吾人將何所作爲，何所表現，何所成就，始能滿足自身之所望，達成理想之人生，此任何青年共同所具之感覺與應有之認識也。青年一生成敗，均

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受社會的進化法則支配著。可是歷史的變遷與發展，究竟是以前進為重心抑是以民生為重心，這問題在哲學範疇內便形成了唯心史觀、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的爭論。但唯心史觀在近世以來，業已失却其價值。近世中，祇有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之理論的發揚，實有研討之必要，茲綜論如下：

史 的 民 生 論 與 史 的 唯 物

唯物史觀是以物質為重心，闡明歷史的變革和發展。但物質的演進可分為自然物質與社會物質，前者是天然存在的；後者是人工建造的。由於物質的意義可分兩種，因此，唯物史觀中便分為自然的唯物史觀與社會的唯物史觀兩種。

自然的唯物史觀是以自然物質為歷史的重心，而解釋人類歷史的變遷和進化的。但因自然物的分類而又分出：天文史觀、地理史觀、生物史觀、種族史觀等。天文史觀是以星球的現象去解釋人類歷史的演進。地理史觀是以地理因子（包括氣候、土壤、山嶽、河流、天然動植物等）作為歷史發展的重心和歷史演變的原動力。又如生物史觀是以「社會集團性」的共同慾求解釋歷史，所謂「社會集團性」，據生物學者的意見，其解釋就是社會有機體在精神生活方面形成一種社會集團人格之謂。因此，由於各個社會集團性的出現，而產生出各國不同的文化形式。再如種族史觀係以種族遺傳性來解釋歷史，主張這種史觀的人，認為種族遺傳是永久的，種族的優劣是天生的，永久不變的；因此，一切社會的發展或衰落，政治經濟的變動，道德品性的優劣，都是由於社會中某種優秀或低劣種族成分的增減關係所使然。這是以種族史觀認為天生的種族的優劣性作為歷史的重心和原動力去解釋歷史的進化和發展。如赫斯爾國家的種族哲學的理論根據，認為日耳曼民族是天生的最優秀的民族，因此，依著他們自己的理想，進行著統治歐洲各劣等民族的大規模的戰爭。

觀其確定如何乃為理想之人生。此理想而正踏堅定，則心安氣壯，自能一往無前；此理想而不獲解答，或雖有認識而不正確不堅定，則徬徨煩悶為所牽之結果，且必一無所成。今日青年何以有徬徨煩悶之現象？實由於未能真切認識其時代環境，因而未能適當考慮其任與前途。所謂適當之考慮者，若以為首先應謀濟，人所前生之國家與個人對國家之關係。居今日中國而論，必先求得國家之獨立與民族之解放，而後方有個人真正的理想人生之可言。如何求得國家之獨立與民族解放？此為國民革命如何成功之問題；而國民革命之成功，端在其革命主義之是否實現，如此主義偉大、真確、完備，且適合於革命之環境，則主義必實現，革命必成功；若此主義不合於中國之時代與環境，則不能實現。主義失敗，而革命亦失敗。是以今日青年誠欲實現其理想之人生，只須認識時代與國家環境，認識革命主義，確定革命思想，認清途徑，全力以赴，則一切煩悶，立可打破，人生意義，灼然不惑，決無徘徊迷感之苦痛矣。

權商之論理論

• 聖彥胡 •

以上四種自然的唯物史觀（自然的物質史觀）是以星球現象、地理因子、社會集團性、種族性等為歷史的重心而解釋人類歷史變遷的。

根據自然的唯物史觀之論點，可余來與民生史觀作一個比較。

民生史觀是以人類求生存為社會進化的原因，這就是承認自然的物質史觀有其正確性。因為人類是由自然而來，是一種自然物質，他之要求生存與動、物之要求生存一樣。以人類求生存之觀點去解釋歷史，就無異是將自然的物質去解釋歷史。在這一點上，民生史觀在原則上是與自然的唯物史觀是相同的。須知人類歷史的自然發展，如果沒有自然的物質，根本就沒有人類社會和歷史，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所以民生史觀承認地理史觀、生物史觀、種族史觀均有其相對的正確性，就如地理史觀來說，很明顯，地理環境實為人類歷史之前提和基本條件，人類不能離開地理環境而活動的。試看寒帶、溫帶、熱帶、大陸的、海洋的、各地的社會環境不同，就看出各個社會發展的特殊形態。

因此，自然的物質對人類歷史的影響是無可否認的，這可說明民生史觀與自然的唯物史觀相同的地方了。這也可說它保存它並吸收自然的唯物史觀的也在這一點，這是自然唯物史觀的正確的部份，科學的民生史觀是應吸收的。

但民生史觀相異於自然的唯物史觀，就是民生史觀所以用以說明歷史之自然的物質，是自然物質發展到最高階段的人類。這最高階段的自然物質——人類，是具有自然物質不同的原素——精神（SPIRIT），因此，他與星球、地理及生物性種族性是不同的，星球地理條件等祇可說是歷史中客觀的被動的因子，而人類則是歷史之主觀的自動的因子，所以唯史哲學家拉皮諾說：「人是客觀的被動的環境中之唯一自動的因子，沒有人類絕對不會有歷史，歷史是人類的獨有的產物」。自然的物質——人類之何以能與一般的自然物質不同，而能成為被動環境中之唯一的自動的因子，並且成為客觀中之主觀而創造歷史呢？這完全是由於人類具有獨特的

精神作用——意識作用，所以人在自然環境中不祇受物質影響，且能積極的克服自然，改變自然，甚至支配自然。民生史觀之不同於自然的唯物史觀，就是看重人類的精神作用——意識作用的性能。

民生史觀之看重精神作用——意識作用，可從地理的「軍人精神教育」演講中的看出來，他說：「武器為物質，能使用此武器者，全倚人之精神，兩相比較，精神之力居其九，物質力量僅居其一。」又說：「物質之力量小，精神的力量大。」（精神重於物質）。因此，在歷史發展過程中，他特別重視人力作用，「人定勝天」之說，足見其對人類生存之決心對歷史形體的演變實有決定的作用。

民生史觀不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而以人類求生存為歷史的基動力，就是側重精神的偉力。本來人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他之所以稱為人，並不是由於它之具物質的肉體，而是具有精神。人類求生存之向上努力與創見，為精神作用之表現，而動植物之求生存是出乎自然的機械的要求，沒有意識作用。而人類的生存的慾望是多方面的，複雜的，除了自然的要求外，同時又有意識的要求，人類之能適應環境甚至改造環境，乃是人類求生的意識要求的象徵，也可證明民生史觀之所以承認了人是客觀的被動的自然環境中之主動的自動的因子的明証。

自然的唯物史觀之主要缺點，就祇看見自然環境影響人，改變人，而忽略人能影響環境，改造環境，即是說，它祇看重自然的力，而忽視人為的力——即人類的精神意識作用，不管天文史觀以星球現象說明歷史變遷，地理史觀以地理因子說明歷史發展，生物史觀以生物集團性說明歷史演進的過程，種族史觀以種族性說明歷史也好，它們共通的缺點，單是以自然力去說明歷史，忽視人為的力。歷史是人類生存活動的紀實，離開了人，就根本不會有歷史，且就地理因子來說，人固然不能離開地理環境而活動，故不免受

地理因子之影響，然而人類如果受地理因子之影響而被控制，被決定，倘不能加以影響者以反決定，那末，人類社會跟其他動物一樣的小能創造歷史，發展歷史了。在這邊，可看出民生史觀揚棄了自然唯物史觀的偉大性了。

概括來說，自然的唯物史觀對歷史的變遷祇看自然力；而民生史觀對歷史的變遷，除了自然力條件的輔助發展外，尤重視人的精神，認為精神的作用在人類之史的進程中有龐大的推動性。

民生史觀提煉了自「唯物史觀的精華，並且也吸取了社會的唯物史觀優美之點，充實了民生史觀的內容。下面再就社會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加以理論上之檢討：

社會唯物史觀，是以社會物質為歷史的重心而解釋人類歷史的變異和進化。社會物質是人類把自然物加工後製成出來的東西，而維繫着人類的生活，通常稱之曰經濟。因此，社會唯物史觀也稱經濟史觀，亦即馬克斯之唯物史觀之原意。這種經濟史觀是以經濟因子為人類歷史中一切現象的決定力，故又可稱經濟決定論。經濟史觀之學說亦不一致，比較為精密的馬克斯之唯物史觀之理論，且與民生史觀來個對照，可看出兩方論據的真理性了。

馬克斯的經濟史觀是以生產工具為社會歷史進化的根源和動力去解釋人類社會史的演變。因此，他認為什麼樣生產工具的形態發展，就產生出怎樣的生產關係；有怎樣的生產關係，就形成了怎樣的政治制度和怎樣的觀念形態，因而構成整個的社會和歷史，適應於生產工具之生產關係之總和，就是經濟機體亦即下層的社會基礎；在這下層的經濟機體中便產生了政治法訓意識形態的社會上層

建築，這便是馬氏的橫的社會結構觀。而他的縱的社會進化史——歷史觀，則以為生產工具的變動究極的動因去說明歷史的變動。詳細說來，就是當生產工具發生變動時，就使生產關係變化，更影響於整個的經濟結構了。下層經濟之變動，就直接的改變了上層的政治、法律、及觀念，其形態的急劇或緩慢的改變，使整個的社會崩潰，新的社會出現了，這是馬克斯社會歷史的變革的疊敘理論了。

但是，政治制度與觀念形態之改變是因了經濟基礎的動搖，而經濟機構又因適應於生產工具及生產關係不同而變，然則，其究極的因子——生產工具又是怎樣變動呢？馬氏告訴我們的是生產工具自身的內在矛盾而變，如此，則經濟史觀在這裡便與自然的唯物史觀之以自然力說明歷史，大體在原則上是沒有多大的區別，這也是異於民生史觀的理論了。

……生產工具既是自身內在矛盾之變動而變動，那末，經濟史觀之生產工具去說明歷史與自然的唯物史觀是以自然力去說明歷史的見解同出一轍，雖然，生產工具係社會的物質，但它不失為物質的範疇，因為社會的物質，一經人類的操作，它便離開人類而獨立成為客觀的物質與自然的物質一樣了。這種社會物質，在人類歷史中，也如自然物一樣是被動的，離開了人類的力的作用時，它的本身是不能變動的。所以經濟史觀與自然唯物史觀的中心理念是同樣的，用客觀的被動的社會物質去說明歷史的發生發展與流落的過程。而民生史觀則否認生產工具的變動並非它本身的在內矛盾所使然，而是歸因於人類求生之慾望之強烈，不斷地向上改進生產工具，增進生產的效能，使生產工具不斷地改善發展與擴大，這便是民生史觀對經濟變動之史的說明，否決經濟史觀對經濟現象變遷之「內在矛盾說」之明證。

正由於這個觀點不同，民生史觀對經濟要素中以何者為重的看法亦與經濟史觀有別，普通所謂經濟的要素有四：（一）生產（二）分配（三）交換（四）消費。經濟史觀認為生產為經濟之中心，其餘的經濟形態都由生產而運行出現，換言之，是就分配為生產而分配，交換是為生產而交換，消費是為生產而消費；民生史觀恰與之相反，認為此四者之中以消費為中心，即是生產是為消費而生產，分配是為消費而分配，交換是為消費而交換，實合乎人類社會的生存史實。所以，經濟史觀以生產為經濟之中心，這理論是不大正確的，孫中山先生說：「經濟的中心是在消費的社會，不取為生產的資本，……所以近來世界上大工業，都是照消費者的需求來製造物品，近來有智識的工人，也是幫助消費者。消費是甚麼問題呢？就是解決家人生存的問題，也就是民生問題，所以工廠之製造是為民生」。這話是很對的。民生史觀是以消費為中心，解釋了人類求生存為歷史進化的正心的正確的結論。

以上的論列，是民生史觀與經濟史觀之不同的見地。但兩者也有相同的地方，那便是社會觀與經濟觀的相同，兩者均側重經濟與社會的發展，民生史觀側重經濟對人類歷史之影響，可在民生主義理論中看出。並且民生史觀之經濟進化觀與經濟史觀之經濟進化觀是一樣的，二者都認為經濟是由採拾而漁獵而畜牧而農業而工商業循序地進化着，孫先生在民生主義中所說的：「由「太古吃菓實」至「漁獵時代」而「游牧時代」變為「農業時代」而由「工商時代」至「進幾個演變的階段，便可證明，這也是民生史觀用經濟進化史去說明社會的進化。

至於民生史觀看重社會之論據，也可由孫先生的話來說明：「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存，國家的生命，「還我同胞的「人民」「社會」「國民」「家業」並不是指一個人

，是指社會的全體。而孫中山先生在民生主義演講中也屢次說：「民生問題就是社會問題。」他把民生看作社會，還邏輯的發展是與經濟史觀一樣的應用社會觀點去說明歷史變遷，而不是應用個人的觀點去說明歷史的變遷的。

這樣，民生史觀是用客觀的社會環境去規範人的行為，說明人的行為，是的，因為人這歷史要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並且要在特定的社會環境內創造歷史，因此，必要把握歷史進化法則，在這一點上，民生史觀與經濟史觀是完全相同的。經濟史觀認為社會進化的過程，可分開始共產時代、私有財產時代（奴隸制度、資本主義制度社會）及未來高級共產時代，這與民生史觀之觀點，大體相同。

孫先生關於社會演進之程序曾這樣說：「共產重權制度，在原始人的時代已實行了，究竟到什麼時候才打破呢？是在金錢發生之後……金錢發生，便以金錢而貨，便形成買賣制度。有錢的商人便成為資本家，到近代發明機器，一切貨物却靠機器生產，有機器的人，更視乎有錢人之上……現在資本家有了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披奪工人的血汗錢，生出窮富相懸殊的階級，互相衝突，便有階級鬥爭……於是便變成工人與商人爭鬥的時代，這階級鬥爭在何時解決呢？必要再回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由此可見兩者之社會史觀是相同的。

總的看來，社會的物質史觀對於歷史的解釋，是看重經濟力量，社會的力量，認為歷史的演變，完全隨經濟的變化而轉移，人的活動就完全受經濟所決定，這種見解，如前所述，是與自然的物質史觀之認為歷史的演變完全受自然力及自然環境所決定，實在沒有多大差別的；其差別之點，那不過是自然的物質，史觀用物質（如地理因子等）來說明歷史，社會的物質史觀之用自然物質來說明歷史，是更具有正確性。然而其不重視歷史的精神作用，則與自然的物質史觀相同的。所以民生史觀對於它之看重經濟社會的理應是保存吸收了，而對於它之不重視意識作用，則予以拋棄，這便是民生史觀在看重經濟與社會方面與社會的物質史觀相同，而在說明經濟與社會的變動方面則與社會的唯物史觀有不同的見解。

三

綜合了民生史觀、自然的物質史觀、與社會史觀的中心理論，看出自然的物質史觀是以自然力去說明歷史的演變，社會的物質史觀以經濟力去說明歷史的演變，它們一致的觀點，就是觀看歷史中之客觀的物質力量，而忽視歷史中的主觀的精神力量；然而歷史之縮述，是由於主觀與客觀之統一，精神與物質之統一，沒有客觀的物質力量，固然不會有歷史；同樣的，沒有主觀的精神力量，也不會產生歷史。但是客觀的物質力量，祇是歷史中的消極的被動因子；祇有主觀的精神力量，才是歷史中之積極的自動的因子。所以在歷史發展中是佔主要的地位的是主觀作用，是精神，並非物質，這便是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最大的差異。

從社會發展史的過程中觀察主觀的精神作用，是支配自然物或社會的物質。但客觀的物質存在也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主觀的意識。因此，民生史觀是不偏重物質力，也並不偏重精神力，它是綜合了物質與精神的潛在的龐大的作用，而闡明物心互相為用，不可分離的。它是歷史哲學中的一個最正確最完美的最高級歷史觀，這也是我們分析民生史觀與唯物史觀所得的結論。

論健康保險

胡體乾

最近社會部擬定健康保險法案，徵求各方專家意見，不久可以見諸實施。這是中國舉辦社會保險的第一步，值得國人深切注意。

社會保險乃是以社會儲蓄的力量，救濟個人所遭不幸的痛苦。在舊日自給自足的社會裏，環境簡單，而家族功能完備。因為環境簡單，所以很少有甚麼意外不幸的事件發生。因為家族功能完備，所以遇到任何不幸，只有送到家裏，由家裏想辦法。疾病傷害要由家裏療養，老幼殘疾要由家族調護，生育出家裏來照顧，死亡由家裏來殮葬。自工業革命以來，工作的危險性隨着工具效率而增加，工人的健康因着工作辛苦，環境惡劣，生活貧乏而消滅。工人離開鄉里，離去家族，家族也失去了往日的功能。而處於破碎。於是工人遇到了無數的不幸事件而沒有法子救濟。十九世紀早期的社會主義大抵由於這些不幸所激發的同情行起來。也正因為這些不幸事件的無法救濟，階級的矛盾才加呈現出來，而迄不能緩和，到了十九世紀下半期，才產生緩和階級矛盾以維持社會現狀的辦法，這就是所謂社會政策。而社會保險乃是社會政策中的主要部分，因為有了保險辦法，工人的痛苦減少，社會矛盾自然緩和了一些。但是到了社會保險制度推行以後，其自身顯出減少工人痛苦的功能，就不止是前，說社會政策的一部分了。一方面，社會各階層皆有保險的需要，所以許多國家的法例，把參加社會保險的範圍推廣到一般社會成

員，而不限於勞工。另一方面，便是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仍舊有以社會儲蓄的力量，救濟個人不幸的必要，因而也有社會保險制度，雖然其制度內容略有不同。因此社會保險制度乃是任何體制下國家部需要的制度。中國為三民主義國家，其辦理社會保險自然是不待多解釋的。

社會保險，致可分為：疾病，災害，老廢，失業等數種。其方法大致都是由參加的個人，備用機關，或公家出錢，儲蓄起來，若參加的個人遇到不幸，就拿這錢來救濟。中國因向來無此制度，須要逐漸推行，所以先舉辦健康保險然後推廣其他種的保險。其所以不名為疾病保險，而名為健康保險，因為健康一語的範圍較廣，疾病不能包括生育，健康保險則可以包括生育。負傷一項與草案說明書中「傷害保險」有近似混雜的毛病。草案說明書中「傷害保險」一詞最好改作「災險保險」，專指因職務上發生疾病，負傷，死亡等事故的保險，與健康保險中的負傷事故自然分別。大概健康保險以這幾件事為範圍是沒有甚麼問題的。

保險制度成立於保險人，被保險人，保險費和保險給付四要件之上。被保險人按定期向保險人納保險費，而於保險事故發生時，由保險人領取保險給付，這是一般保險的通常形式。但一般保險還有時由被保險人以外的人作要保人。健康保險則完全依前列公式。俾社會部草案按其保險人分為強制被保險人與任意被保險人兩種，以低報酬的受雇人為強制被保險人，以報酬較高之受僱人及有一定職業，一定收入的一般國民為任意被保險人。保險人為健康保險社，分為地方健康保險社，事務健康保險社，公務員健康保險社三種。保險給付分為：負傷給付，生育給付，死亡給付，家屬給付四種，各種給付又有正常給付與附加給付。保險費屬於任意被保險人的，由被保險人自己繳納，屬於強制被保險人的，由被保險人與僱用人平均分担，被保險人依酬日額分為若干等級，按等級納保險費，得保險給付。這是社會部擬健康保險法案的概略。大體來說，都是採集各國立法例的優點，並斟酌國情，甚為周密。

關於健康保險常有四大問題：關於被保險人有強制參加與任意參加的問題；關於保險社有私人經營與公家經營的問題；關於保險費與保險給付有均一定額與比例定額的問題；關於保險糾紛有行政解決與司法解決的問題。

最初的保險制度總是任意參加。第一因為保險原為被保險人的利益，被保險人自無無故不願參加之理。如果他真不願參加，應該是別有困難，如果不管他自己有無困難而一定要他參加，勢將反而給他不利，違反了立法原意。第二保險收費關係個人財產，強制保險等於強制徵收財產，還在十九世紀也有許多人不同意。美國強制保險法也曾因此被判為違憲。

但是到了社會保險事業推行稍久，便發現了任意參加辦法的不足。第一、保險制度的本質就在於均担損失，就是使未遇不幸的人，分担遭遇不幸者的痛苦。所以參加的人愈多，其效果愈大。若是有些人憚於無事而不參加，或者因自己已有特別便利以為無須參加而不參加，則均担的範圍會為之縮小，均担的原則甚且為之破壞，這是不應有的。第二、還有些受僱人不能參加任意保險，並非因為不願，乃是因為工資太少，或者僱用人不肯負擔一部分。如果僱用人肯把受僱人的保險費加在工資裏，並且願自任一部而將其結果由物價上轉嫁或由利潤中扣除，受僱人自該有不願參加保險的。至於財產的觀念今昔大有不同，天賦權利的觀念已經被法定權利的觀念所替代，強制保險自然不違法律原則。

我國社會部保險法草案乃是折衷於任意參加與強制參加之間。草案中一方面規定受僱人，為強制被保險人，公務員，學徒，從專家內工業者亦視為受僱人（第八條）；另一方面又規定有一定職業而一年收入在一定金額以下之國民皆得為任意被保險人（第十一條），受僱人而得報關者超過一定金額亦不為強制被保險人（第九條），但若因報關增加而失強制被保險人資格者，仍得為任意被保險人（第十一條）。如此規定其要旨是受僱人為強制被保險人，而一般國民為任意被保險人，報關低者為強制被保險人，而報關高者為任意被保險人。因為受僱人保險較容易扣繳，乃有強制參加之可能。

報關高者可以自己備蓄餘資以備不幸，並無強制參加的必要。折衷立法較為完密。

關於草案，有一點補充意見。第八條規定學徒及從事家內工業者視為受僱人，有兩點需要解釋。第一，「從事家內工業」如是家庭成員，在家內從事工業，應該屬於有一定職業的國民，因為他並無僱傭關係，且無法算定報酬，無法視為受僱人。如其是非家庭成員，而在他人家內從事工業，這和小的作房相同，其為受僱人甚是顯然，無須另文規定。只有從事家內家事工作之人其工作與生產勞動不異，似有特別提及的必要。然而這只能名之為「家內工作」，不能名為「家內工業」。所以尚待解釋。

第二，學徒一項不知是否包括各級學校學生？就受僱人文義解釋，頗難包括在內。且學生也沒有報酬可言。在草案中另處規定公立學校教職員工役加入公務員保險社，學生亦不在內（第三十條）。但是學生今日有許多都是經濟來源斷絕，靠政府維持生活，更無力出費藥等費，其疾病發生最速辦法。各國學生也有參加健康保險的實例。所以在此也需要有補充規定。

其次關於保險社私人經營與公家經營問題。本來保險社的初期都是由私人家經營的。生命火災等保險並且是由私人相互保險作起，以後方纔發展到專門保險營業。私人經營的長處是保險社經營人，就是保險費繳納人的代表，因而能够審密管理款項，給付也不肯濫發，事務費也能够緊縮，保險事業終容易發展。另一方面，公家經營的保險社，雖說是比較公平，不致專對個人刻薄，或專對個人偏袒。但因經營者處在局外，也容易會拿不心疼的錢送人情。若屬於一定職業受僱人的保險事業，即由僱用人與受僱人直接經營，則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對被保險人的情況容易知道清楚，並可以迅速決定給付額數，迅速交付，使被保險人早日得到救濟。

相反的，公家經營的保險社辦事難稍遲緩，考核難欠嚴密，但就社會保險本身的性質看來，究竟是社會功能，並非受僱人和僱用人兩方的私事。若完全交僱用人與受僱人兩方處理，恐怕有時使雙方矛盾加強，更多不便。還是有第三人在中間，容易解決問題。

且健康保險乃不以僱用人與受僱人為範圍，而以社會為範圍。如前所說各種任意被保險人，即組織私人保險社，也得不到受僱人與僱用人應得處理的便利。這也是保險社應公眾經營的理由。

社會部草案規定也是採二書之長。地方健康保險社和機關公務員健康保險社由主管官署主持設立。專職健康保險社和機關公務員健康保險社由副被保險人二分之一以上同意，經主管官署認可設立（第二十四條及第三十二條）。其管理機關分理事會，代表會及監事。各種保險社理事會中理事長皆由主管官署選派（第三十五條）。其理事，在公務員健康保險社由主管官署選派；在地方健康保險社由主管官署及被保險人各選一半；在專職健康保險社由事業經營人與被保險人各選一半（第三十五條）。代表會之代表在公務員健康保險社由被保險人選舉；在地方健康保險社及專職健康保險社，由事業經營人及被保險人雙方各選同數（第四十條）。這些規定，在理事會和代表會中，被保險人和事業經營人及主管官各得適當的位置，其於分配權力煞費斟酌。

關於此問題的補充意見。第一在地方健康保險社中，原和事業健康保險社一體。僱用人和受僱人均須保險費。而在地方健康保險社中，僱用人無權參加理事會，似欠公平。第二，在公務員保險社中，代表會屬於被保險人而理事會為主管官署所派，很容易形成理事會和代表會對立的毛病。第三，地方健康保險社中尚有任何被保險人，即事業經營人之代表與全體被保險人代表權相同，又據事業經營人所提代表權過高。茲擬修正如下：公務員健康保險社之代表及理事，半由官派，半由被保險人選舉。事業健康保險社之代表及理事，則半由被保險人選出，半由事業經營人選出。地方健康保險社之代表及理事，則由被保險人選出一半，其餘由被保險人與任意被保險人依其人數比例而舉出代表。再由事業經營人選出與強制被保險人代表同數之代表，主管官署派山與任意被保險人代表同數之代表。至於監事如何選出，草案竟無明文規定，僅在代表會職權上列有選舉監事一項。若監事由主管官署選派，較為妥當。

第三，論到保險費與保險給付應均一分担與比例分担的問題。

還是社會保險中最值討論的問題。均一分担是無論個人，凡參加保險，即須納同額的保險費，而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受領同額的保險給付。比例分担是參加保險的人均按其收入或報酬繳納保險費，而於保險事故發生時受領，比例於收入或報酬的保險給付。比例主義的理由是保險既為以社會備蓄分担個人所遇不幸的災禍損失，則不但是人力來分担，還是財力來分担，所以應該比例於被保險人保險費。並且個人的生活程度不同，即所受不幸之痛苦不同，例如病傷的保險給付，不能不隨及領給付人平日住房好壞，食肉多少。因此保險給付應該適應於個人的需要，也就是應以報酬為比例。

均一主義的理由是社會保險的目標既在於救濟低級受僱人，則其保險給付自以低級受僱人生活為標準。既其生活程度較低的人，平日應有個人儲蓄，社會保險的救濟或者非其所需，或者就是其所需，而除最低要求部分以外，也可以自行儲備。至於保險費若不同保險給付的多少，而一切按收入分担原是合理的。但是若給付均一而納費分級，於人情上有些不合。至於社會部草案說明書第十項中所說「近來物價劇烈變動，採取均一主義，則須不斷改正法律，否則法律不合實際。採取比例主義，因為報酬與物價常向同一之方向變動，作目標之伸縮，使法與現自然相適合，無修改法律之必要。」這並非比例主義最顯理由。若以最低生活消費費為標準，則均一生義也可以適應物價。所以均一主義與比例主義各有所長，而比例納費，均一給付乃是合理的辦法。

社會部草案雖以比例主義為主，也兼採均一主義的精神。其所規定一保險費之收取及保險給付之給與，應就被保險人所獲報酬，分為若干級，釐定各級之標準報酬日額，按其日額之多寡，比例計算之（第一條）。還是明期的比例主義。但實際上只保險費按報酬日額比例計算（第一百十二條），其各種保險給付並不全按報酬日額計算。健康保險之保險給付共分四種：病傷給付，生育給付，死亡給付，家屬給付（第六十七條），病傷給付中的殘廢，是不以報酬為標準的，（第七十九至，一十一條）只有傷別津貼是按報酬的（第八十四條）。生育給付的生產費也是不以報酬為標準的，只生育津貼

心與物

羅鴻詔

自特爾爾把心物打破以來，四百年間，心物問題擾亂人們的腦海，迄今仍未獲圓滿的解決。美國的心理學家先說過：近代哲學的解決，好比一發小石子擊水晶打破，一邊哭泣，一邊補救。但是彌縫的工夫究不若破裂的力量之大，故二元論，多元論也。管不盛極一時。哲學本應知識以認識世界，而知識的本質似乎只能見相依而存關係，不能是本必賴絕對，物理已極通貫，則萬殊必歸一本。於此所謂絕對，所謂唯一，乃為處之所有，而人知所難求，舉世徬徨，均在此處途上繞圈子。我現在當然不敢抄得這種種問題，只將問題之所在指明而已。我以為這個問題須分兩方面來觀察，一方是認識論，一方是本體論。其間也發表些個人的意見，但意見到底底是意見，不能即認為真理。

先從認識論說起。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應從物出發呢？還是應從心出發？這個出發點的爭論也似乎很熱烈。其實，我們的世界都是物心混合的，孩童的知識得自成人（父兄師長），已有許多社會傳統的概念，想找到一個明白而清晰（Clear and distinct）的概念來做出發點，特爾爾在解析幾何學上選定「一線段」為單位，雖經幾大大成功，而以「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為哲學的出發點，却未能博得一致贊同。認識論的問題在乎知識之靠得住與靠不住，如果這個中心觀點沒有爭論的餘地，則從心物何方出發，都不是問題的核心。

第二，先後問題，與出發點頗有連帶關係，也順便說說。列事根據古生物學，地質學等學科學證明先有物而後有心。這個問題在本體論上的意義以後再說。若就認識論而言，則先有物而後有心，我們便能據此以斷唯物論之必真嗎？換句話說，我們知道了孰先孰後，便知孰強孰弱嗎？真理是價值，有優劣之分，先後是事實，無高低之別。故在認識論上，事實先在的，不一定比在後的更靠得住，知識之進步往往後勝於前，根本不能據先後判定其高下。且近代認識論以批判科學而成立，對於科學的結論正要求悉其根據，尋求其理由。比方，

是以報酬為標準（第九十條）。死亡給付的喪葬費和遺族津貼以報酬為比例，但喪葬費有最低數量限制（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零一條）。家屬給付有治療、生產費、生育津貼、喪葬費。除生存津貼以外，無專以報酬為標準的。所以說此草案雖明言採比例主義，實含很大的物一主義成分。

關於此草案可商榷者，一為報酬與收入字樣有不同。草案中於受個人為強制保險人便論報酬，於有一定職業一定收入之人為任意被保險人，又論收入。任意被保險人所得乃是收入，並非報酬。其繳納保險費，受領保險給付，只能以收入為比例，不能以報酬為比例。所以嚴格講起來，在草案中編任意被保險人如何繳費領給付之規定，此至少的補充是報酬和收入兩名詞的統一。如不能統一，至少也須補足一條，說任意被保險人的收入，於保險費及保險給付的計算上，視為報酬。其次，中國社會裏還有得不到長期保險而農業上或工業上零散工作維持生活的人，其生活比受領人更苦。他們只能為任意被保險人，其保險費全由自己繳納，似可增加規定，任意被保險人中收入屬最低級的，政府可補助其保險費全部或一部。

現在論到保險問題糾紛應由司法解決與行政解決的問題。司法解決是關於保險糾紛應訴向法院起訴，依一般訴訟程序解決。行政解決是訴願到主管官署，以至上級主管官署以求最後決定。司法解決的長處是法院處超然地位，裁判公平。其缺點為法院對於健康

科學上說：幾萬年以前有某某生物，而今則無之；幾千萬年以前，一切生物都還沒有，但是地殼已經形成，礦物亦已存在。我們正要問，這些說法憑甚麼根據，有甚麼理由。一經探求，則知科學家的憑據乃是現在的化石，地層，而不是千萬年以前的東西。所以那些科學的結論所以靠得住，乃因為現在眼看得到的，手續得覺的東西。故問題之所在不是先後。

第二，反映論，摹寫論為唯物論之中心，機械的唯物論與辯證的唯物論都沒有兩樣。一反映一物的原義由鏡子而來，謂物質反映於人心，即是說心譬如一個鏡子，物來則照，還它元來的樣子，不爽分毫。蠶粟一來，人心只是一副機械，對於外物不能為選擇，抽象之功。還在古代此論已引起絕大的懷疑，近代特嘉爾欲以動物為機械，而拉、羅特利 (La Mettrie) 則以人類為機械，法國唯物論者羅素相唱和，而一經勞格的批評，不能不倒。蓋人類之於外物雖有所接觸，而且能順應之，安插之，而釋放種種圖案，自不可與鏡子，照相機等等機械等量齊觀。辯證法的唯物論雖以為思維之反映外物比感覺更為確切，凡抽象，安插等等工作無不應承認，較之機械觀已進一步。然而吾人以為「反映」一詞極易引人誤解，謂思維「反映」外物，而又謂思維不是鏡子，不是照相機，孰若將「反映」廢而不用，另代以適當的新言？馬克思常用「把握」一詞，我輩，實發「反映」為合適。總之，若將反映解作完全被動的接受，則成為機械論，而此路不通；若將反映解作自動的把握，則「反映論」似應取消。「摹寫」似有二義：一義是將美好的鉛印字模印在紙上；一義是描畫的寫生。若取前義，則人心如一張白紙，則為完全被動的接受，與機械論相同，可以不談，故今取後義。寫生以逼真為目的，「原型」外在，不可動搖，但安排選擇僅有運用思維的餘地，故小孩子初學塗鴉，往往不能類似，而天才畫家的作品亦與常人有天淵之別。謂思維之摹寫實在感覺更為過骨，自不致陷於機械論之錯誤。但是難關仍未能釋脫。今撇開自然現象不談（請看下面），過去與將來並不能圓滿解釋。過去的事實（譬如唐太宗曾經做過皇帝）則原型已失，摹寫未免模糊，惟根據人證物證而據理以推斷而已。將來的事實則原型未立，欲摹寫而無從，然而據當前的情勢而憑想以推，也往往有奇驗。比方，馬克斯在資本論中斷定競爭必歸於獨占，望復美國的經濟發展已將其理論證實，然在當時並無獨占為原型以供其摹寫，他何以能夠寫得逼真呢？故摹寫之說即使能解釋現在，亦無術以說明過去與將來的真理。

三

即就當前之外物而論，摹寫之適與否，仍有疑問。因為我們摹寫外物，第一個的憑據只由感官所獲的種種感覺，這感覺是否靠得住呢？洛克已將物的性質分為第一、第二兩種，而謂第二性質如色，香，味等等是主觀的，因各人而不同。換句話說，感覺之摹寫外物一部

保險的專門並非內行，所利有礙失當，並且審判程序進行太慢，對於被保險人的需要，往往不能如願滿意。行政解決的長處是可以迅速決定，並且能解專門技術，但是因地位不是超然，有時被成見影響裁判。還是兩種辦法的短長。

社會部草案也是取折衷辦法。若保險社無正當理由不為保險給付，有保險給付受權人得逕向法院起訴（第三百二十二條）。若保險社無正當理由不照已定數額給與或不依期給與保險給付，保險給付受領權人得逕請法院強制執行（第三百三十三條）。對於保險費保險給付的異議得訴願於主管官署，不服主管官署之決定得起訴於法院（第三百三十條）。主管官署對保險異議得設保險審查會審查之（第三百三十一條）。所以此草案是兼採行政解決和司法解決的。

對此點也略有修正意見。關於不為給付或不按期照數給付，固可由法院判決或執行，至於給付數目屬技術性質，可以由主管官署決定，並且還有健康保險審查會的組織，不想不得公平。訴願的方法也可以達到最高主管官署，已屬嚴重的能事。若將此專門性質之專交普通法院作最後決定恐怕多有失當之虞，還不如以最高主管官署為最後決定，較為可靠。至於行政司法兩部分的關係，在中國制度上屬平行，並無如有夢家所行，以司法裁判行政的制度。若在特殊法規上規定司法判決高於行政決定，恐更易發生職權上的糾葛。若把無理由不為給付，與不按期照數給付的案件由法院判決執行，把徵費與給付的異議由主管官署決定，各方均得服從。

總之健康保險法的制定實因中國社會立法的新紀元。深望早日實行，增加社會福利，免除民衆痛苦，以建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

分是靠不住的。蓋巴克列竟將物質根本推翻，而謂存在等於知覺，以完成其觀念論。你謂某物為存在，你認識了它嗎？若未認識，何以知其存在？若已認識，則你必先知覺它，而心中有它的觀念了。這便是觀念論（唯心論）之中心論點。經康德的分析以後，外物的存在只是推而知之的，我們的知識世界僅限於現象，即憑感官所得的表象，觀念，由思维的機能去構造成功的，與客體渺不相涉。觀念之中有想像的，有再生的，有當前的。想像的觀念頗有廣大的自由，可以任意安插，任意聯合，但此不能為確實知識的根據乃是顯而易見的。再生的觀念雖為過去所曾有，而其呈顯於心中往往模糊不清，甚至犯重大的錯誤，亦非知識之最後的倚靠。我們以為可以信賴的知識，其總體的根據仍是當前的觀念。這種觀念不能任意使它生滅，也不能任意使它如此如彼，豈不是為客觀存在所決定，而感官與思维只能做摹寫的工夫嗎？

照觀念論者的說法，這種觀念也不是被客觀存在決定的。比方，兩個石頭一擲，我們覺着光；煤油燈、電燈、也覺着光；甚至眼睛被人一拳打來，也覺着光。照物理化學語，兩石相碰是固體的衝擊；煤油燈是炭素的變化；電燈是電流與金屬接觸；眼睛被打是神經受到特別的刺激——凡此種種，其客觀存在都是不相類似的，而我們的感覺却把它們歸入一類，而名之曰「光」。由此可知，我們的感覺自有格式，積極的去應付

自然，並不是僅僅的摹寫。這些理論，我想，自然科學即使現在還沒有解明，將來也可求出一元的解釋來。思维與感官是否摹寫，或者有完全解決的可能。然而此摹寫之逼真與否實無從比較。外物雖然存在，但人類對它只有感官得到的性質，再沒有其他。我們雖能將水中活躍的鯉魚（原紙上畫出的鯉魚（摹寫）相比較，但決不能將感覺到鯉魚（摹寫）與未被感覺的鯉魚（原型）相比較。故說它是逼真固屬無根，說它是不肖亦未免是武斷。如果所謂「物」是指「未被感覺的東西」，而其理乃指思维與感官摹寫此「物」之逼真，則此理失其標準，或竟至於無真理了。我想，如此之「物」是超乎知識世界以外的，我們實無法拉它到知識世界之中，故真理之本質不在乎摹寫此「物」，而別有所在。至若所謂「物」乃是「人心中所得之物像」，則為外物與人的官能配合起來而後成功的，至少已經過感官的作用，不能謂感官摹寫它，思维對它也能想法支配，不必去做摹寫的工夫了。

唯物論者似乎可以說，心中的物像即是客觀存在之物（心外的物如），中間並沒有差別。即是說感官之摹寫外物是逼真的，但只限於局部，不能觀其會通。故須思维幫忙，其摹寫始能更加精確不移。然而思维之認識外物自有其所憑藉，即是思维自己的機能，此機能即使不是康德之所謂範疇，也決不是物質（不論心中的物像與心外的物如）進一步談，思维之所攝取的，不但不是心外的物

如，也不是心中的物像，乃是其（物如或物像）普遍的內容。這物是剝刻變化的，我們得自物的印像也跟著變化，這種變動不居，遷流無常的東西，我們自不能執之以為比較，分析的對象，則所謂「觀其會通」乃是不可罷了。只因我們可將其不相干局的殊相除開，而把握其共相，然後可以作全局的觀察，而會而通之。故知識世界之重要成分，不是物如，也不是物像，乃是物之共相（普遍的內容）。知識所以能執範御繁，以一持萬，即在於此。

人類的知識雖必憑感覺為起點，而感覺之所得，必為殊相，若個個只限於此心中的物像，我們的思维儘可自由取舍。至于心外的物如，則不但非思维能取舍，不能確定，即感官之所得是否逼真亦仍有疑問。謝以為我們儘可將知識世界限定於心中的物像，而將心外之物如當作一個待解決的問題，當作方程式中的未知數（X, Y, Z），我們儘可想出種種方法去解答此問題。而知識世界即因此而擴大，而加深。

四

那麼，知識世界豈不是限於「現象」，而心外之物乃是真正的「本體」嗎？於是本體論乃成問題。

唯物論者定物質能離意識而獨存，有獨立觀念者雖欲努力推翻它，但終於無效。且上面曾經說過，據科學的證明，未有生物而巳先有物質了。夫然，則宇宙的本體是物質

，而精神，靈識，心等乃是生物之所有，不過物質之作用，即物質有了巧妙的組織以後必然呈現的作用罷了。但是唯心論者却憑西洋的傳統，要抬出上帝來，而問題乃轉到他一團。照基督教傳來的說法，這個世界是上帝帶造出來的。雖然聖經上那造的程序不必與近代科學相符，但若將程序逐步一點，儘可以說上帝依照科學所說的程序逐步造出這世界來。故就先後問題來說，他們堅持先有上帝而後有世界。就構造問題而論，則這宇宙是否有主宰？若有，其與宇宙的關係如何？這便是西方形而上學的問題。牛頓的世界觀幾乎完全是機械說，但機械不會自動，所以要上帝給它第一衝擊，以後就永久不會止息，可按照因果律去研究了。但是上帝之心外之物如更是一個疑問符，在虛信的人，想證明其為有，而使人信服，是不可能的。自Aachenius以來，各方的證明均歸失敗。現在略舉Aachenius及特嘉爾之實體論的證明，以見一斑。完全的概念應具有一切性質，神（上帝）是完全的概念，而存在為性質之一，故神應有存在。這種推論自極合形式，但存在與性質不分，總致大謬。平常所謂性質是具於物中，由思惟抽象而得之。但是要證明神在，而以存在為性質之一，其前提之謬自難辯護。四方之形而上學，離開有神論便走獨唯物論去。上帝之存在已不能證明，自不若心外之物有憑有據。但是我們認識心外之物，也只能認識其性質，而性質乃是與官能配合成功的，不但客體之質况如何，終

於被封鎖住，不許吾人窺探，而且主客之如何配合，亦屬難明。我們雖能將心外之物證明其有獨自的存在，比上帝稍勝一籌，但除此以外不再知其他了。比方，運動便是性質之一，普通講說覺觸而知之。自哥白尼以後，大家更知道，感官所覺的動（如太陽之東昇西墜）未必是對的，須依思維決定之。那麼，所謂動靜都和人類的主觀有絕大的關係了。最近證明運動之相對（即與主觀有關），所提之證據尤多。即此一例，可概其餘。總之，本體論上的唯心論，要證明有神，終歸失敗，唯物論只證明物在，此外更不能開口，且往往流為機械論而陷於不通，故近代以還，多半欲走中間的路子，然亦徬徨而不能定奪。像牛頓的上帝，不知幾千萬年前，確和我們這個世界有一次關係，但其後即拱手無為，一任機械的運行，不加干涉，豈不是「有若無，實若虛」嗎？把上帝推到遙遠的後台去，以維持其有，其與無神論相去幾何？辯證法的唯物論已將上帝除掉，只好拾出一個「矛盾」先生來推動世界，要和邏輯打官司，知識之依據又成問題，思惟之自發性不敢作率直的承認，要請它去反映，去摹寫。F. H. Green效法Fichte的自我，把上帝拉到人身之中去求其實現，說法雖然有技巧，然而全能的上帝何以要借人的身體來實現，而不能任意直行，一空依傍呢？

我們以為靈不顯的上帝，只好說它沒有，不必多繞圈子；心外之物既已永遠是待解決的問題，只能憑推論而知其存在，則當它是本體，也和我們的知識行動沒有關係，則索性根據心中的「物便」，以求確實的知識，而為行動之指針，也就够人生受用了。可是形而上的問題並不因此而解決，即理想與現實之關係究應如何，乃是人們所以探求形而上而不可已者，本體論之努力即所以追求「永遠」，哲學與宗教理無二致。求「自我實現」的誠然已假定人生有最高的目的；即宗「辯證唯物」的又何嘗不以社會主義為最高理想，而舍生以取其義呢？基督教的理想以上帝為理想的化身，十九世紀的卡爾爾，其痛斥無神論，即以理想為根據。然而我們中國歷代的思想即不認「有神」而又非「唯物」，只要「主敬」「存誠」，便能「知命」「知天」，不像西洋之「道在近而求諸遠」。故在「有神」與「唯物」之間，儼然有康莊坦蕩的大「道」在，我們何不循此向前，以達其理想境界呢？「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一程伯子已發見形而上為道，聖雖遠而言未濶，積極「修養」，便可獲得圓滿的解決，「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之上物莫不有理」；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等，則萬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朱子的「雙料工夫（心與物）以先得我心之所同然，由認識論以至形而上學，我們有往可繼，自然事半功倍。慎隱明舍物而論心，又復歸於「單料」，有清二百餘年思想橫受摧殘，宋學不絕如續。今日欲合中西而求其會通，我個人以為將宋學發揚光大，即可以解決形而上學的問題，較求之西方近代思想家，更為直捷而了當。

「靜」與「動」

• 張 老 •

——之討論的象跡中學哲行力——

(一)

從來一般人對於「動」與「靜」這兩個概念底認識，只能將視線在字面上滑溜，而未曾加以深入作進一步的觀察，這誤認「動」與「靜」兩個概念是對立的而絕對不相容。附會這項說法的人，他們可以舉出物理學中所謂「動者恒動，靜者恒靜。」的定律，作為有力的引證，振振有詞，說什麼根據科學原理而推移出來底肯定話。

物理學的說法以解釋物理領域中的現象，屢試屢應，這點我們是同意的，但人類行為有精神意識在乎其間。若偏偏將「人」看作無靈魂的軀殼，僅是副生活機能，那未免犯上嚴重底錯誤了。

實在「動」與「靜」並不是照一般人所看到的絕對不相容，絕對底對立，只要明乎人類生活上精神底作用，我們會發覺這兩者原在他的相互聯繫性，有解他添雜性。

蔣委員長說：「在跡象上看，雖然是有動有靜，但在整個過程中，向外表現發展的時候，固然是行，生機潛藏成長的時候也是行，祇要合乎天理，順乎正軌，動亦是行，靜亦是行。」（行的道理 P. 111）

「行」就是將「動」與「靜」溶化在生之進程裏，作為統貫的聯繫，消滅這兩者間的對立性而歸入溶洽的化合中。「動」與「靜」的交流，突出人生的節奏。

這裏要與明白「動」與「靜」在人類「行」中的作用，及其兩者之轉換，溶化，發展，的一串進程。我們得先探明「動」與「靜」的真義。

「動」雖不開「靜」，離開了「靜」是無法解釋的。在生物學上有所謂動物，在物理學上有所謂動能 (Kinetic energy) 動量 (Vector)。

在生理學上更有所謂「動脈」，經濟學上有所謂「動產」「動用」等名詞。

大堆的說法，非我們所要找尋的，我們要通過生活跡象上「行」的表現，而去看「動」與「靜」的究竟。我國古之聖賢看「動」是有幾種看法的：

魏晉云：「兵以義動。」

陸符說：「動其機，萬化安。」

列子注更云：「機者罕有之始，動之所宗。」

底說明：這全是站在人類行為上去看「動」，給以一很肯定的說明，至於將「動」看作是出自內心，而稱之為自動的。我們中國古籍裏亦有明確的說明：

梁試賦：「羣動咸遂。」

轉意文：「來往動皆逐月。」

還有說：「足以動衆，未足以化民。」

這全是將動看做感性的。

而孟子：「不動心，有頂乎？」而將動的下面加上個疑問號。

至於「靜」的方面，同樣地也排列在「動」的一邊，才能在「行」中加以認識的。

「靜」是一種寧靜而有安適的有思想的生活表現。
杜甫詩：「喧靜不同科。」
大學：「靜而後能安。」
管子：「曲靜之官不可道。」

動是如彼，靜是如此，這便是「動」與「靜」的兩個意義底大概了。

(三)

印度哲人泰戈爾，當其論到東西文化的時辰，曾對「動」與「靜」有節明確的指示：「……兩種都不能偏廢；有靜無動則成惰性，有動無靜則如趨於沙上。」（新潮三卷一號）

這足以作為我們生活上參攷的一條公說，人類的一生活動永遠是離不了「動」與「靜」，誰也不相信好動的人，而從沒有他的「靜」之點，好「靜」的人，同樣道理，也不是沒有「動」的地方。現在所討論的問題並不是要止於此，我們所要明白的却在「行」中的「動」與「靜」底作用，如何使「動」與「靜」才能有合理的表現，以求人生事業上一步之更上，而通到我們理想所追求的目的。

當稱「一動而支百動，史記上更謂「靜以有謀」，只有動與靜配合起來，動才能找到其正常發展的路線。我們雖絕對地反對道家上半生修養的靜功，但詩云：「靜曾思之。」却不奪我們有所反對。任是時下一般所宜稱的現在乃是「忙」的時代了，一切生活呈出極度緊張狀態，但「忙」絕不是「忙」到連思索的時間也沒有。偷真的話，這一切生活跡象也無暇思索，那結果便如蔣委員長所說：

「動的力量也未始不浩大，可是因為沒有理性作基礎，不是出於自發和自覺，因而動過一番以後便靜止下來或是歸於沉澱和寂滅，好像一口鐘一樣，要待人去敲，總會鳴響，不去敲；就靜寂了。」（行的道理四〇）
由此可知，靜乃是理性的綜合體，否則並非真靜，僅是死寂寂靜耳，而動也必需受靜的支持，才能發揮出更大的力量。
不過這理也明白，動並非是一種附屬品，他也有自身的作用，別忘記當生活外圍作各種表現時，在跟各項事物相接觸，他可以督促「靜」的不斷反省，不斷觀察，充實了理智的內容，更完整地確立了理智的體系。

(四)

過往曾有人因談：「靜裏思動，動裏思靜」。作為青年人修養的法則，作為生活的指導。這僅是種標準的看法，無異於將「動」與「靜」活列開而成為極度對立。這看法是不合「力行」原則的，也不合現實的要求。

蔣委員長：「同時相應從力行中去求其知」，「也唯有能行而後能知」。

「靜裏思動，動裏思靜」。這僅是種浮誇的人生觀，將人生看作毫無意義而虛渺，靜得發慌了，去動動吧！動得太過了，靜靜吧！

這是我們所要求的麼？不！這不是我們生活上所要求的。青年人有的只是學習熱誠，有的是過大理想，其個人嚴厲的訓練，理想計劃之完成，決非「動裏思靜，靜裏思動」所能奏效。我們要將「動」與「靜」作密切的配合，外表是動的，內心是靜的，所謂靜心修身是也。只有這樣才能成為理智的學習，真正的「行」。倘若外動而內靜，結果像「一口鐘」一樣，要待人去敲，總會振動。「多鐘數口釘子便寂然無聞，存永無的靜止。

基於這種原因，所以我們生活必需隨着「行」的原則，將「動」與「靜」作密切的配合。

靜 與 動

笠 李

子孔認體何如應

近人研究孔子的，以為漢以前的孔子與漢以後的不同。還是史事演變的公例，無足怪的。一切史蹟俱隨着政治教育風俗……之薰陶，逐漸地變相，還是無法避免的事情。

不但孔子如此，其他古代偉大人物亦沒有一個不受顯公例支配的。不過程度上有高下深淺……之別罷了。例如老子在太史公作傳時，已無從確定其人，所以老子列傳中有老聃太史儋老萊子三個名字，互相影射，互相糅合，令人無從捉摸。漢以後更逐漸地「超人化」起來，一直變成後世道教的太上老君，太上老君君，又豈太史公所能料及？其變化的程度豈非比孔子更為進步嗎？

史事的變遷，和人心的向背大有關係，時代和環境不同，當然毀譽的標準亦不同；即同一時代，同一環境，因為教育或學術的異趣，觀點亦往往互異。史記弟子列傳贊云：「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這可證明仲尼門人在西漢初期，學術界已有毀譽二派的爭執了。後來孔道大尊，譽者得勢，毀者的一方，就自然地消滅聲聞。司馬遷大膽地列孔子為世家，表示推崇的意思，亦可見漢初人對孔子的一般心理。

與對七十子之徒尚有持異議者，已大不相同了！孔子在漢代地位的提高，是無可否認的事實，雖王充論衡有問孔之文，但終究不敢有過分非薄的意見；且還是極少數人的學術思想之出入，不是以同轉「萬法同歸」之洪潮的。

孔子學說，因為含有尊君之成份，所以歷代君主都利用他，把孔子的行事加上很濃厚的渲染色彩，——專制色彩，封建色彩，……時代越久，渲染的色彩越多，其相亦越趨越其極。夫子之道，真有迷離情況，「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之感呀！這一點是和其他古人很不同的地方。漢高祖劉季本不好儒，以儒冠為洩溺器，罵陸賈曰：「乃公居馬上而得之，安事詩書？」後來因孫叔敖定了朝儀，纔知道皇帝的尊貴，纔覺得儒家的體樂與自身很有利益，因聯想到提倡禮樂標榜尊君的孔子是大可利用的。所以就不惜迂屈皇帝的尊貴，遍舉舉行祭祀孔子的典禮。孔子因為帝王的尊榮，沒有人再敢明目張胆地反對或諷刺他，可是孔老夫子的本相，亦因此而無失其真，這是何等可悲的事情呀！孔子事蹟的變遷，歷代專制君主固然負有一部分責任，但從前的學術思想亦不少因利用孔子而為之染色的：如漢代的讖緯家《春秋》之外更造出神名稱，以孔子與「經」相對立。捏造了許多陰陽五行說神鬼的怪話，硬安在孔子身上，尙幸識解之說後世不行，不然的話孔子又是第二個太上老君了。他如諸子百家因孔子名大，製造孔子的言行，以發揮自家的思想者，更不勝枚舉。所以歷來的史學家文學家……可說莫不各有其自家的一位孔老夫子，即如許慎之解釋文字，本是一種客觀的工作，但其解「王」字云：「王：天下所歸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遺文者，三畫而連其中謂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參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貫三爲王。』」解「士」字云：「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從一從十。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近人從金石甲骨文字考證，知「王」字原不從「三」，「士」字亦非推「十」，好像孔子是外行人冒充文字學家，其實就學術思想史的立場稍加觀察，便知此等話非富有陰陽五行色彩的漢儒是不會說的，董仲舒的話，好像跟着孔子說的，其實「一貫三」之言，就是仲舒自己的話，或

其他「同道者」的話，借孔子的名望以行其欺人的本領罷了。如真以此等話爲出於孔子，那麼莊子對盜跖的話，亦不是寓言了！古代不必說，即如現代，即如最近派出的經學家，經今文學者如康有爲輩以孔子爲素王，爲作經之人。同時的古文學者，却都以爲孔子「述而不作」，六經只經他刪定而已。這兩派心目中的孔子，相去多麼遠呀！吾人習聞，不大加以理會，這又是何等可悲的事情呀！民國初年的一班新文化運動者，主張打倒「孔家店」，言之亦似成理，其實這輩人亦只是受滿清前代帝王和諸子百家經學家……的欺騙罷了，原來「孔家店」雖遭了老根株，但早已不是原主了！孔子之遺蹟因時代的推移而變遷者甚多，其實孔子本不是原主了！本來就是善變遷，適合時代與環境的。孟子稱孔子爲「聖之時」，如其實不謬，那麼假定孔子生於漢世，或唐宋，或現代，當然和周代的孔子不是一樣，假定生於南方，也許會和北方的孔子異態，不過此種殊異，和政治教育風格……所渲染的，和專制時代君主之利用，愚者的智識，而加上假裝而不自然的孔子，性質根本不同，所以不能相提並論。孔子對環境的應合，比任何學者爲注意；可從其政論上的各種姿態見之：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他日又復問政，孔子曰「政在節財」；這是因時間的先後而異其言的。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遠」；子路問孔子：「衛君待而異政，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這是因時空俱變而異其言的，其教育亦隨地隨人而殊異其旨歸：冉子問「聞斯行諸？」孔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對於一個問題，竟可以相反之言爲調，孔子自己的解釋是「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這真可以顯露出一個「母道母愛」，因人設教的孔老夫子。

評論孔子一人，雖難認清假裝的孔子，但如「聞之」的處境而嘗議言行，也會同樣地發生笑話。禮記檀弓有一段記載，可以爲例：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曾子曰「問喪」，曾子曰「問喪」，曾子曰「問喪」。

「有子問於曾子曰『問喪』，曾子曰『問喪』，曾子曰『問喪』，曾子曰『問喪』。」

叔反，位，謂必誠實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質也，喪不如速食之愈也！」喪之欲速食，爲最誠實之言也。

了解孔子的人，應真誠於他的弟子，從上說故事來說，倘沒有子游的發明，就是他的高第弟子已以其說爲非君子之言，何況他人？何況後世？換一句話說，如果經濟正常的道理以衡量非正常的，變化的，從權的，事應，則「孔家店」導獨民初一部分青年要打倒他，便是孔子同時的人，便是孔門的弟子，也要打倒他哩！

孔子的話有適應環境的，時過境遷便覺異態，如魯君之說，在專制時代以爲天經地義，在民主時代則爲衆人所詬病。亦有永遠不廢，千載常新，一切時空間的變換都不能出其彀中的：例如孔子論日，亦爲「敬節節」，孔子是周代的大教育家，他所自承的「學不厭而教不倦」，豈非教師的永久模範嗎？更有隨時隨地想到孔子的遺訓，大之可以興奮精神，進取有爲；小之亦可以安慰性情，減少苦悶。先舉前者的例來說：當抗戰初年，我們住在廣州石牌，時常受着敵機空襲的畏骨和恐怖，我就以教師的身份聯想到孔子長區及鄭宋的幾句話：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這種堅強而偉大的自信心，可以壯發膽識，可以增加抗戰信念。得舉後者的例來說：自粵交關判黃南渡江，衣的是土布之衣，食的是粗糲之食，住上瀟下瀟都出入的土房，行崎嶇不平驛馬同羣的荒徑，簡陋的程度，爲抗戰以前意想所不到的，我又以孔子居九夷的話自勉：

「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所以在許多人同聲歡笑的境界，我還可以洋洋得意。現在國難嚴重，教育界同人俱從困苦艱難中奮鬥，物價的漲風有一日千里之概，吾輩薪水菲薄，現在雖還沒有絕狀，但已有不少程度從公的朋友了，我再舉一件孔子的故事做尾聲，與衆教師同人共勉之：

「孔子絕糧於陳，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誦誦，絃歌不絕。」

希望我們的教師朋友，在糶米爲炊，兒女啼啼號號的時候，一味此言，包你曾因心理的作用，管著三軍如挾纊的故事滋味吧！本文爲李教授在中山大學孔子誕辰紀念會演詞，對於孔子言行因應變遷之點，頗足爲研究孔子思想者之助。——編者識。

三民主義文獻問題

杜定友

在提倡三民主義文化運動聲中，對於三民主義文獻的徵集整理，實為一重要問題。

國父畢生奔走革命，而手不釋卷。他全部的遺教，實為古今中外思想的大成，治東西新舊學術於一爐，所創的孫文學說三民主義，既能宏遠的思想的一部份。而且當時爲了普及通俗起見，把較深奧的意思，較專門的名詞，都避免不用。現在我們要澈底了解三民主義，先要明白他的思想背景，參考各科學說，才能有深刻的研究，才可以發揚光大。若是祇拿一本三民主義作聖經，當規章看，而不能融貫貫通，都末於學術文化上，毫無補益。三民主義祇是我們文化運動的中心思想和永久目標。但實行方法，還需要與時代環境互相配合，對於近代的社會科學，尤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要了解和研究三民主義，非有充分的參攷材料不可。這種材料，爲整理保存及參攷便利起見，名爲三民主義文獻。

三民主義文獻的內容，就廣義言，可以說包含全部學術。因爲國父學識的廣博，思想的周詳，在他的遺教裏，無論天文地理，文化教育，軍事政治，經濟工程，詩歌文

藝，歷史經典，包羅萬有，無一不備。世界上所有圖書典籍，都可以爲國父遺教的註脚。不過這個範圍太廣闊了，反而失去三民主義文獻的專意。所以我們祇就狹義的，約分爲四個部門：

(一) 國父遺教 凡國父的言論著述，及闡述三民主義的一切作品屬之。

(二) 國父史傳 國父的思想言行，生活軼事，與三民主義息息相關。我們後世子孫，應該永遠爲典則的。

(三) 本黨文獻 國父與中國國民黨，是分不開的。所以關於本黨的著述也應列入。

(四) 總裁言論 壽總統是國父主義的最高承繼者，對於三民主義之發揚光大，實利賴之。

至於文獻的種類，絕不以圖書爲限。凡片紙殘字，殘篇斷簡，雜誌論文，報紙剪報，標語傳單，手繪表格，圖照畫片，演說聲片活動影片，碑刻匾額，都在搜集之列。過去的學者，祇重文字上的鑽研，圖書館則缺

有書而無圖。而不知文獻二字，實包括人類一切記載。古者左圖右史，不可偏廢。書本不過是其中之一而已。對於實物的保存，雖有博物館和古物保存所等，但在國內，尙未普遍的設立。且人類歷史的記載，除實物之外，還有很多。這大部份應是圖書館的責任。我們在徵集三民主義文獻的時候，不可不注意之。

三民主義文獻爲研究三民主義的基本材料。凡研究三民主義者，都要廣爲搜集，以便參攷。而各機關各學校各圖書館，更應有專門的皮藏，公諸同好。並爲國父留永久紀念，以期國父遺教之普及與深化。使全體國民，對於三民主義，都有潛移默化的認識，才能普及天下。有深刻的研究，才能發揚光大。有堅決的信仰，才能見諸實行。三民主義能够實行，才能達到人類永久的幸福，大同快樂的世界。這是我們每一個國民的責任。不過三民主義文獻的收集，若不隨時隨地留心，並有固定的機關，一貫的政策，很難收效。二十年前，作者任廣東省圖書館館長，當時該館規模甚小，除了殘舊線裝書數萬冊以外，對於新文化新科學的書，可以說一本

也沒有。本來圖書館這個職守，向來是一個閒缺。為多數由前清遺老、翰林進士們退休之所。除了抱殘守缺之外，還有其他的任務。但是他們是否克盡厥職，却頗成疑問。作者接辦之後，一方面整理舊藏，添置新書。一方面擴充範圍，建設新館。設立廣東圖書館籌備會，草擬計劃，館內加設「光復紀念部」。將中外印刷品凡關於我國光復革命的記載，無論片紙隻字，無不抄錄。他如革命傳人的肖像手蹟，照片遺物，陳列保存，以資觀感。豈非但強有研究的價值，而且于歷史上有重大的意義。可惜政府當局，對於這歷史文化的偉大意義，不甚注意。這籌備會，祇曇花一現。後來因為政局關係，本人亦離粵他去。而繼任省立圖書館的人，對於這重要的歷史材料，竟置之不理。孔子已有「文獻不足徵」之嘆。這種教訓，我們在幾千年後，還不能深思反省，真令人不勝惋惜之至。

民國十六年，作者返粵，任中大圖書館職。於是舊事重提，在該館第一期擴充計劃中，創設「革命文庫」。搜集革命以來歷年有關之出版物，以供索覽。以國父倡導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對於理論方面和宣傳方面，國父個人和其他同志所著的長篇短簡，當然不在少數。但散在各處，無人專事搜集，真是我們罪愆。國父革命者的一番心事！當時除在中大肆意抄錄之外，並撰「圖書館與黨化教育」一文。提出圖書審查，主張「由黨部組織革命圖書審查訂章，將現行各種革

命書籍，詳加審訂。訂定各種標準，編列各種書目。比如一個小學生，至少應該讀些什麼黨義的書？中學大學又怎樣？各機關職員又怎樣？一個國民黨黨員至少應該讀些什麼書？要研究國民黨的歷史，應先看那本書？應參攷那篇論文等等？並設種種方法以資考核。務使全國國民，都有充份的革命智識。正確的革命思想」。可惜人微言輕，這種意見，至十年後，中央及各省才有圖書審查會的設立。但工作多偏于消極在禁方面，而作者所提議的積極工作，還似很少辦到。該文更提倡黨部設革命圖書室，原文說「各黨部須另購一室或另立一室，專藏革命圖書，以供黨員讀的參攷和閱覽。各黨部所應備的圖書，也應有一個最低限度，以便照備。如有經費不足則由上級黨部補助，或由上級黨部大幫購進，然後分送各處，較為經濟。並派專員分赴各處視察和指導一切，其他各學校各機關各旅舍，也可依照辦理」。原文載民國十六年中大出版政治週刊第八期（八頁）現在各黨部都已設有中山室，但內容如何，不得而知。最近有文化雜誌，更為進步。但因交通困難，成效未著。至於各學校各機關各旅舍等，關於黨的圖書之充實，尙未見辦到。這一件事，筆者已提倡廿年，未獲成效，坐見吾黨文獻，散佚無存，可憐孰甚！

至於個人主辦的中大圖書館，在民國十七年間，經費尙稱充裕。對於革命文獻，乃得盡力抄錄。當時所藏，凡一千一百餘冊。其中以各種不同版本的三民主義三十餘冊，外國文譯本七八種，尤為珍貴。但於十七年秋，本人因事離粵。繼任者欲在數年中，更迭無常，所藏圖書，亦作鳥獸散。至廿五年本人再返粵後，則所餘者僅百餘卷。自廣州失陷，連年遷徙，損失更甚。撫屍尋骨，深滋痛惜。在一個紀念國父的大學，天天講三民主義，而對於我黨文獻，零落不全，真是慚愧欲死。數年以來，欲圖恢復，則以抄求困難。欲存原稿，無從購辦。且圖書經費，往往積壓。有書的時候沒有錢，有錢的時候沒有書。這種情形，現在國內的圖書館，大概如此。有心無力，徒呼負負。

本年拜命復長省立圖書館，以廣東為革命策源地，對於我黨文獻，在理應比其地各處，較為齊全。乃二十年來人事變遷，館務中斷。現在另起爐灶，萬分困難。已往的出版物，經大火一炬，無法抄求。各地刊物，時斷時續，應付為難。但保存文獻，為圖書館之天職，不得不勉力從事。除現有圖書盡量購置外，還希望公私藏家，多方協助，始克有成。

同時在中大方面，成立中山文庫。抄存圖書四百餘種，圖畫一百餘幅，於本年三月十二日，與省館所辦之「三民主義之偉大」的展覽，同時開幕。希望這小小的園地，得以補前愆。

三民主義之偉大，決不是幾百本圖書所能表現其萬一的。我們還應大量的搜集，普遍的宣傳。非但中大圖書館和廣東省立圖書館，舉凡力於此。就是全國各圖書館、各黨部、各學校、各機關，都要有同樣的設置，使三民主義普及人間，照耀萬世。這是每一個中華國民國民的責任！（完）

譯
述

告德意志國民

菲希特著
馬采節譯

第一講 緒論

這演講是我三年前在漢堡講過，後來改題為「現代的特徵」而付梓的講義的續稿。記得那時我曾這樣說：人類全體發展的過程，可以分為五個時期，時代屬於第三期，這時期的一切活動是充金以自私的衝動為中心的。但在這極短促不滿三年的歲月中，某國（按即指德國）早已完全離開這時代。某國因為國民利己心極度的發展，喪失了自己的獨立，而陷于自滅的悲境。故在情況完全一變的今日，我感覺到對於這時代，負有加以再度說明的義務。

喪失了國家的獨立，同時便又喪失了推動時代的力量，喪失了自由地決定時代的內容，而國家本身的目的，便不得不操在外人手裡。她已沒有自己的時間，祇有用外國的事情或朝代，去計算自己的年代。我們如果要再從這狀態，察總圖，唯有另圖一個新世界，創造一個新時代，發展新世界，充實這新時代。我相信這新世界是必能創造出來的。這次演講的目的，便在指示諸君這新世界的本質，把這新世界的模型，擺在諸君的眼前，說明創造這新世界的辦法。

但在未開始說明之前，我盼望諸君別要忘記下列各點的前提，又在必要上，願予以各點，能知我的意見一致。

第一、我是對德國人全體，就德國人全體而說的。我對於過去

作為德國人的通病之門戶之見，不獨不予承認，而且斷斷拒絕。因為最近數百年來，在這本國同胞的我們中間所造成種種不幸，都是從這裡分化出來的。被愛的同胞諸君！我的眼睛也常諸君一諸君是德意志全體國民的代表，是將成我的演講的印刷品，不題而定使諸君感奮的演講活力的一部，將變成舞育的印刷品，不題而定，到震憾起國人的情緒，警覺他們的覺醒和決心吧。對德國人全體，就德國人全體，我這樣說。這是一有適當的機會，便要把它說明的。就是：唯有「德意志」的統一，才是真正的統一；唯有「德意志」國民的團結，才是有意義的國民的團結。我國民所以能免于被外國吞噬，所以能創其獨立的自我，就是由于這被稱為「德國魂」的我們的共性。

第二、我的聽者者是不至因其過去所受的損失，不勝其痛苦，進而甘受這痛苦，滿足于可憐的狀態，隨遇而安，得過且過，而率喪失其現在遇進的精神的。不，我的聽者者却能自拔于痛苦，進而為明晰的思慮與默想，或至少保持着這樣的力量。我理解他們的痛苦。我比較任何人更能覺痛苦。我感受這痛苦。倘若因卑屈而保全生命，因不受肉體上的苦楚，自覺滿足，視「榮譽」「自由」「獨立」為空虛的名詞，掛標人與本質就喪失痛苦資格。其實，這痛苦却是寫着刺激我們的思慮與良心而存在的。我們若不能由痛苦感受到救，便不得不由這痛苦而失掉思慮，失掉救的金部力量。而我們的不幸也就達到極點了。我不願意在這裏提起我們

必有外來的援助，或指出國嚴情將引起什麼變化，使君君起超于痛苦。因為這不是必然的自救，不是憑自己的力量去救自己，而是憑盲目的偶然去救自己。我要求諸君明瞭我們所處的地位，明瞭我們所保存的力量，明瞭我們所以自救的方法。

第三，因為我盼望德國人，能承認他們自己現實的地位，所以期待諸君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事物（外國的有色眼鏡，有意使人發生幻覺，不適用於德國人的眼睛），有真正精實的勇氣；確定地目擊這不幸，而試為嘗試；冷靜地覺察這不幸，而加以分析。我們若不依照這明瞭的覺察，是不能站在支配這「不幸」的地位的。我們唯有把握整個時代的姿態，明白國家所處的地位，鞏固自己的主張，然後才能和「不幸」奮鬥，調步進步，否則沒有確實的尊嚴，缺乏堅固的信念，循不得不自目的地傍徨于夢幻之間了。

其實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去逃避這明瞭的認識呢？當前的災難，既不能因為我們不知而減少，亦不能因為我們知道而增多。不，我們若不知道它，亦就無法去救它。

我要求諸君保持這樣的態度：作為德國人自己，不為他痛苦所支配，有追求真理的熱心，有應付當前困難的勇氣。這些都是本講演一語一句所隱伏的蘊藏。以次略述本講演根本內容的梗概。

我在前面說過，英國因為利己心極度的發展，結果不得不歸于自滅。這是怎麼發生的？利己心普遍是在受他國統治階層之後，再受延而侵蝕統治階層，于是上下交鋒，而利己心遂成他們生活唯一的一衝動，達到發展的最高度。這樣的政府，最初在其對外關係，僅連結本國與外國安寧的一切標準于不顧，食圖本國一時的安逸，不計自己對於國際集團的義務，只要自己的國境，不被侵蝕，便以為天下太平，高枕無憂，而陷于可憐的利己的自欺，至其對內關係，把提政調的力量，又極脆弱，人民對於政府，無所畏懼，這在外國語

叫做「民主」，自由」，但在正確的德國話，卻應叫做「頹廢」，「無感覺」。

這該，統治者與被治者同時墮落，當然一受外力的打擊，國家也就不得不歸于破滅。國內的人民，因為不長懷本國的統治者，而畏懼外國的侵略者，所以甘心背棄本國政府，獻媚外國。這為人民所背棄的統治者，亦只有屈服外國的計劃，保其殘喘，而放下保衛祖國的武器，投降外敵的內奸，也就站在外國的旗下，倒戈而迎向祖國。我說利己心極度的發展，結果不得不歸于滅亡，其故就在這裡。

我們已不能運用普通的方法，去把陷在這依存狀態的國民，從這樣的悲境解救出來，我們只有運用過去未嘗用過的新方法，去創造新秩序。那末，就讓我們仔細觀察吧！什麼是過去舊秩序的基礎呢？為什麼這樣的舊秩序不得不必然地歸于破滅呢？我們若能明白這一點，我們便可依照與此破滅的原因正相反對的事實，製造一個新因素，納在這時代中，去管理這沈淪的國民，而伸長出一個新生命。

由於檢對這破滅的原因，我們可以看出過去的一切組織，國家全體的利益是與國民個人的利害連繫在一起的。現在這連環環有好處被切斷，沒有顧慮到國家的利害，而國民的團結亦因而而鬆懈。我們現在只有努力去發見一個新的，而且超越彼此利害的連環，把全體的事務和個人的事情，自然地連繫起來。

連繫彼此利害，而且和利害接近的動機，便是所謂道德的肯定或否定的精神的動機。習于清潔與秩序的肉眼，目擊一羣一滴的污垢，或凌亂無序的器物，雖不至直接給予痛苦，而仍感然不安，衷心不能自逸。反之，習于污穢與無序者，卻處于污穢之中，安之若素。人類的靈魂亦是與此一機就敏的，它在自己或國家的生存上，看見紛亂混雜的景象，或寡廉鮮恥的事態，總是為之坐立不寧

，若芒刺在背，非把它拔去不可。由這靈眼的所有者看來，全體的事情，是由于道德的肯定或否定的動感感情，與自己的事情不可分離地聯繫着的。他那被擴大了的自己，把自己看作全體的一部，只要看見愉快的全體，便能感到滿足。如此訓練國民的靈腦，便是喪失獨立的民族，所以自孩子死亡，而躋于生存的唯一的方法。我所提議的救亡的方法，便是改革現行的教育制度，養成新人，教育全體國民，使其獲得一個新生命。

過去的教育，雖不忘把宗教道德法律等觀念，以及各種秩序良風美俗的圖形，放在學生的眼前，使其實踐此等圖形所教導的生活，而施以訓練。但舊教育的子弟，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大多是不遵守這些觀念與訓練的。他們完全不受教育的影响。他們完全聽命于自然的利己衝動。這事實足以證明舊教育只以二三名詞成語，裝填學生的腦袋，只以二三朦朧褪色的圖形，渲染他們沈滯的思想，盡其能事，而缺乏一種熱力，足以強化道德法則的圖形，使學生對此生出熱愛和渴慕，以適應實生活，使利己心枯草敗葉般脫落。這教育所結下來的果實，早已爛爛墮地，在世界人士眼前，露這堆壘者的無力，我們現在無須徒勞再踏進它的內部，去分析它的果實和脈絡。嚴正地說，舊教育絕不是人類養成的方法。我們必須發明這方法。這是新教育的主要任務。

又過去這不完全的教育，僅限于極少數人，叫做教育階級，而作為國家基礎的大多數人，却完全和教育隔絕。我們的新教育，目的在養成德國人，使成一個共同的全體，而這共同的全體之每一分子，都感覺有同一大事在共心目之中。新教育適用於德國人全體，絕不許有例外。新教育不是階級教育，不是通俗教育，而是真正的德意志國民教育。

我在這講演首先向德意志的智識階級提議，並且希望他們能作

這新事業的發起人，本其平日社會的活動，去領導世人，以保持他們日後的信用。過去德意志對於人類發展的努力，大多由平民發起。偉大的國民事業，是常在平民手裏，由于他們的愛護而助長的。故此回把國民基礎教育的重任，交給智識階級，算是第一次。智識階級能否獲得這事業的領導權，亦只有看他們此次的努力如何以為斷。

總之，這講演之目的，不外欲對於破壞者，鼓其勇氣與希望，對於愁苦者，予以歡欣，使大危迫的關頭，能够安穩地渡過。這時代正像一個死靈魂。他一方面雖然受着新生的啓示，躍出前途一點光明；而另一方面却仍流戀着生前寸步不離的尸體，念念不忘那翻百病叢生的臭皮囊。這死靈魂時代，即現在的時代，要怎樣去處置呢？新世界的晨曦已昇到地平線上了。羣山的峯巒已染出金黃色，準備黎明之到臨了。我願靈力把這黎明的光輝，織成一面明鏡，反映出那喪失自己于悲痛之中的時代的姿態，使其相信尚未死滅。又在鏡子上面，反映他的中心力量，把這力量開展的形象，製成豫言的幻影，一一活躍于眼簾之間。在這一覽之餘，他過去的生活姿態，便無疑將從他的眼前消逝，而死靈魂亦將沒有過度的悲哀，而歸到他應歸的歸宿了。

★非希特的「告德意志國民」(Ro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是從一八〇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起，至翌年三月二十日止，他在柏林向當時學者、教師，及其他愛國志士演說的記錄。那時候正值普法戰後，柏林被拿破崙的大軍佔領。他演愛國講演，對於德意志的精神復興，是起了相當重要的作用的。現在把它節譯成中文，在本刊逐期發表，幸讀者不吝指正。(譯者)

時事述評

李鶴飛

（本報記者採訪）

最近，我國政府對於通商口岸之管理，已趨於嚴密。此種政策之實施，固足以維護國家之利益，然亦不免引起外界之疑慮。蓋通商口岸之繁榮，實為我國經濟之命脈，若管理過嚴，恐將影響商民之利益，進而影響國家之財政。故政府之政策，應以維護國家利益為前提，同時亦應顧及商民之利益，方能達到預期之效果。

美金儲蓄券

日據待中外新聞記者座
上發表政府對於美
國貸款五萬萬元的運用
已決定辦法為發行美金
一萬萬元，每百元法幣

價值美金六元。同時政府又發行三十一年度
美金節約儲蓄券一萬萬元，每百元法幣可購
五元美金。現在美金儲蓄券，經已發行，暢
銷各地；重慶門售，已近四萬萬元，昆明一
經發行，即售出五萬八千餘萬元。

當英美兩國政府決定貸款之時，我國朝
野對於運用問題，有詳密討論，而其焦點在

於如何始能增強我國的戰時經濟。在增強方
針中，最主要的莫過乎提高法幣的信用，使
人民不致被囤物資，促成物價高漲。要增強
法幣的信用，當然以發行金公債或儲蓄券，
最有力。國家籌措戰費，不外三途：而發
行公債，增加租稅，與增發鈔票。此三種辦
法之中，以發行公債，最為妥當。且適於公
平負擔原則，早為古今經濟學者所公認。但
發行公債，必須全國人民有承銷的能力，才
無阻礙。故強制人民儲蓄，或延期支付的辦法
，是長期抗戰的國家，所不能不採的政策。
戰時通貨增加是不可避免的，即以美
國之富，羅斯福總統而以預防通貨膨脹警告
其國人，可見通貨膨脹是戰爭的副產物，而
不能不設法收回通貨。收回的方法，莫善於
獎勵儲蓄與發行公債。其次財政當局利用借
款以發行金公債與金儲蓄券，一方面勸導人
民儲蓄，他方面可使人民增加對法幣的信用
。儲蓄儲蓄，盡量購買公債，不特可使法幣
回籠，而且可使物資不至囤積，是最妥善的
辦法。我們相信國人必能透澈理解政府苦心
，一致贊助，使能按照原定計劃，今年可以
收回四十萬萬元的法幣，這不獨可以增強法
幣信用，而且可以減少社會的游資，不獨可
以減少法幣的數量，而且可以肅清物資的囤
積。

公務員福利

貼津物實

（本報記者採訪）

最近物價問題而來
的，是公務員生活的改
善問題。最近物價統制
局已擬訂改善公務員生
活辦法，決定實施節費
津貼。計每一公務員不

論有無眷屬，一律每月發給米一市石，油鹽
各三市斤，煤炭三公斤，每年發布二十丈，
如家屬不在渝，可依原官價折領貨金。至原
來規定之生活補助費，及家屬平價米，則一
律取消，如實物津貼辦理不易實行時，則於
原有薪額外，每月加給補助費津貼一次四百
四十元。

公務員在近代政治機構中，十足是一個
人民公僕。他們在公務方面，受着嚴格的自
規限制，物質的壓迫又過度緊張，往往減低
工作的效能。五年以來，他們的艱苦忍耐，
另在私生活方面，是值得我們敬佩的。可是
在抗戰建國的大業中，我們對於幹事最基
本工作的公務員，必須改善他們的生活，減
輕他們生活的重負，使他們的志趣能够安定
，使他們能安心努力于本位的工作。轉得加
緊推進抗戰建國之各種重要任務。據我們所
知道，政府當局，無時無刻不關心公務員的
生活，中央最高會議中，時常討論到這一個

問題；如津貼加薪，也不知辦過多少次了，可是過去的辦法，就患在不能統一，致無效。現在改用實收津貼的辦法，能够統一一致，不至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被物價問題弄得頭昏腦脹，這是一個最合理的辦法了。

我國當增強與同盟

軍事代表團 抵 華 領 事

由前式輝將軍率領領事團，四月十三日行抵華盛頓，他們此行之任務，在使我國與華府參謀長聯

合會議之關係益形密切。鮑氏為國內有識之軍事家，我們相信該國抵美以後，對中美英軍事關係，必有重大貢獻。

今日太平洋戰局形勢發展，有識之士，表示焦慮，這也難怪的。倭艦對俄還是趁

着閃擊戰的一陣旋風，這是準備問題，準備一充足，從海上截斷日本的補給線，那要它的遠征軍將變為餓殍，也隨軍艦變為廢艦。所以，就過去而論，與其說日本兵力雄厚，毋寧說是同盟國對敵認識不夠，缺乏決心所致；進一步說，與其說是同盟國戰略的失敗，更毋寧說是政略的失敗。在目前，我們固不必互相推諉，彼此責備，但我們要求正

視現實，拿出決心，勿斤斤于自身的利害，而應考慮到整個戰局演變的關健。同盟國家

今後如何決心以求進步，這是一個政略上的問題，開明的政略才能產生進步的戰略。這是一定的邏輯；我們希望代表團諸君去親達美國以後，不僅對中美軍事聯系，努力促進，對政略的問題，尤應促使同盟國家的普遍注意。

國家總動員法

國民政府於三月廿九日

總動員法

明令公佈，并經於五月五日開始實行，全文共

規 有

三十二條。我們對此，

應有幾個基本的認識：

第一、貫徹抗戰目的——抗戰五年來，我們艱苦力無窮，人力衆多，取之不盡，用之不絕，率能艱苦支撐，打擊敵敵。自太平洋戰爭烽火燃燃，由兩個國家單獨的戰爭，轉變為兩個陣線對立的搏鬥，戰爭的範圍既已擴大，戰爭的期間將更延長；為着支持長期戰爭，為着確保最後勝利，加強總動員自屬不容緩。國家動員法頒布的意義，在第一條即明白宣示：『為集中運用全國之人力物力，加強國防力量，貫徹抗戰目的。』這就是我們要求着認識的。第二、加強戰時統制；

無可諱言的。我們過去為着組織力量的薄弱，統制效果未著。我們深知現代的戰爭，完全是組織的戰爭，要實施組織，必先加強統制，能統制則一切才有組織，其能運動組織

與統制，始可謂為總動員。在國家總動員法中，關於動員的業務與物資，固在統制之列，即人力的征用，從業者，退還與報關，勞動糾紛的防止，農地的分配，金融機關新事業的整理，人民言論出版著作集會結社等等，都要受適當的統制。因為惟能如此，才足以一結四萬萬人之心為一心，合四萬萬之力為一力。第三、充分發揮戰鬥力量——這美的戰爭，不僅關係我們一個民族的生死存亡，而且是整個反侵略陣線的成敗，所以無分前方與後方，無論敵別與否，不僅要消極的服從管制，更要積極的發揮力量，竭盡我們全部的時間精力，為抗戰而奮鬥，這才是國家總動員的根本意義。

我們希望同胞深切認識此種法令意義的重大，一德一心，矢志奉行，以完成抗戰使命，爭取民主國家的最後勝利。

這是一個驚人的社稷，同盟國的神靈，於四月十八日降臨而據據後國本土的土登，在東京，大阪，神戶，名古屋，各處散下了鐵的警告，這個沉重的警告，足顯喚醒開閉的迷夢

同盟國國家機關 東京 乘 炸 轟

青年
通訊

寫給現代青年的一封信

覺 任

××君

你的來信已經見到，你說你對於現狀不滿足，因而憤恨，憤懣。你將因此而走兩條路：一條路是消沉，翻放，墮落，一切不關心，聽其自然地得過且過下去；另一條是積極地徹底地破壞現在一切的制度以求革命的實現。你以為這兩條路都是對的。

我當然不以為你十二分的情，但我不能不老老實實地告訴你，你所謂的兩條路，都不是生路，而都是死路。現在你這且平心靜氣地聽我講。

我並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相反地，我以為對於現狀不滿足的青年，總是有作用的青年。但是不滿現狀，而僅僅坐在屋裡嘆氣，算這消沉，却不是有作用的青年。你這路雖通，也不是能夠有作用的青年。我們應當實現現狀以不能令我們滿足的原因，以及如何改進的方法，然而這談話容易，此種非到苦功不可。而你偏偏忽略了這一點。一切夢想的起點，可以勝都是出不滿現狀來的。一切革命的發動，也都是由不滿現狀來的。國父本來告訴我們「現在革命尚未成功，他及曾指示我們「革命的基礎在高深學問之上。」但學問是積年累月的苦功，千百萬人的心血。你要走的路，第一條是不

水學問，第二條是不要學問，這是我期以爲不可的。

第一我先勸你不必太悲觀。我是學生物學的人，三句不離本行。生物學上最基本的功，是精確詳密地觀察各個動物或植物而給予他一個適當的地位，這叫做分類。我希望你將你自己，精確詳密地觀察一下；你的聰明如何，能力如何，學業如何，行為如何，體魄你自己如何估計一下，在社會裡應當佔怎樣一個地位。那時你將有兩個相反的發覺：一個你將發覺到你在整個社會裡，是實在太渺小了，實在不配當難人家。因為社會國家是許多人的，他的好壞，是任何一個人不能負責任，却又是任何一個人都負責任，所以你得先責備你自己。一個是你將發覺人家對你並不錯，也許你所佔的地位，已經遠勝你的體力，這便覺得你的責任更加重大了。你到這時候，你自然不會從然不滿足現狀，也不會放棄了你的責任。你便將安心從事你的學業或做你的工作了。日進月進。

青年人有他的優點，但也有他的缺點。而他的優點，又很容易地變為缺點。譬如說青年人有不顧一切勇往直前的精神，有見到便做的果敢，往往就是浮躁、輕率、莽撞、狂亂的原因。如何可以保持這些好的精神，而避免那些壞行動，完全在學問的修養

經驗的積累。現在有幾人專門想利用青年的熱誠，而不想培養青年的優點。譬如說有一種三個月或六個月畢業的大學，說是從籌募軍費以後，便可以負捐軍國大事了。這種信軍事政治是這樣容易嗎？又有人以為不必讀書，祇要有信仰，便有辦法。我知以爲沒有疑問，便不能強辦事物，更不能理解事物，便無所謂信仰，沒有信仰，便沒有力量。

請到現在，你當能明白什麼有許多人不聽你們多讀書的道理了。這道理是：讀書以後，請其此外還有許多自稱教育家的人們，勸你們不要在教室裏讀死書。我以下骨都惡死。豈但書是死的，一切不能活動的東西都可以說是死的。但是一遇到活人，就可以那樣成活的。幾萬噸的軍艦，一遇活人，便立開從大洋的遺跡，到那大洋的那邊。幾千噸的空中飛船，一遇活人便飛到天上。去。爭氣老先生可以從死搬硬活出裏有引力的大道運來。費也是一樣，遇到活人，便是活著。遇到死人，便是死著。古天本報和舊報都不如讀書，意思就是使你活用書本，能活用書本，任何書均可讀，故又曰「開卷有益」。如何活用書本？全在讀書的人能力如何。此能力如何而來？又全在他說的書多不多，知識豐富不豐富。學問修養不修養，仍要從書本中得來。爲什麼呢？因為書是數千年

來人類智識的遺產。有了書，我們讀他以後，可以少走許多冤枉路。他可以幫助我們理解事物，判斷事理。你要改良社會，救國救民，你如沒有這些基礎，我包你不能成功。無論你是硬幹苦幹苦幹苦幹，恐怕終久脫不了亂幹。我讀到這理，你可明白。國父爲什麼每日都要讀幾小時書，領袖爲什麼要數十年如一日地每日日記筆記。他們的偉大就在這個地方。你若是要有所行動，譬如說你要革命，我一點也不反對，但第一個條件，是不要忘了。國父講的「革命之基礎在高深學問之上」。三個月畢業的學問，不配談革命。

我再三再四地勸你讀書。你也許會說，你這迂腐的老先生，你該知道讀書，你不知道現在在中國的政治哲學，不合時代潮流。所以人民得不到幸福。我得告訴你，世上既有真理，就有是非，沒有甚麼時代潮流。我現在又要三句不離本行，根據生物學，來證明你以爲救世救民的那些狂人們的政治學，是不合乎自然界的原則的。你大概知道達爾文的自然淘汰說，被他們拿去做資本論的基礎，做階級鬥爭的根據，但是另一方面看特拉也拿去做他的工具，說德國是最優秀的民族，應享特殊權利。結果他們利用得是否得當。達爾文的學說，到底在生物學上，是不是真理呢？因爲最近二十年生物學的進步，現在已知道他並不是生物學的真理。最多祇能說在自然界中，上千上萬的實例中，有這麼幾個，可以用他來解釋。我們要注意，解釋實例的說明，未必就是真理，何況尚有其他許多不能用他來解釋的實例。譬如說生

存競爭的結果，是自然淘汰。那末爲甚麼古代許多在生存競爭的場合，佔絕對優勢的生物，會完全絕種呢？在古物學上有許多的例子，足以證明生物在生存競爭場上佔優勢的原因，便是他將來絕種的原因。換句話說，生存競爭是生物絕種的真理，而不是生物進化的真理。我們拿他來做政治哲學的根據。我們還是希望進化呢？還是希望絕種呢？我相信你一定爲希望進化的。那我得勸你，趕快放棄了這些狂人們的政治哲學。

達爾文的高汰說，就是根據形體學，沒有根據生理學。最近二十年因爲生理學的進步。證明生物進化除去形體的改變，還要有生理的調和。那些盛極一時「奇形怪狀」的古代生物，所以一剎那便絕種的原故，就是因爲失去了生理的調和。生物身體是一羣細胞所構成，是一個極其複雜的有機體。他可以因爲內在的原因，或外來的刺激，而有所改變。但必得維持細胞內部的平衡，細胞與細胞間的平衡，身體各部分的平衡，身體內部與身體外部的平衡，方可以生存，於後可以進化。否則即使身體有所改變，但失去了種種平衡，則整個生物學，未必能生存，遑論進化。如果讀古生物學，你就可以知道許多動物，身體進化到最激烈的時候，便是他快要絕種的時候。而那些變化復和平的動物，却自古至今，仍舊存在。進化後，調和易，平衡未失，當然可以維持久遠了。中國立國悠遠之道，亦深合乎生物哲學的原則。中庸之道，在中國是一切處世哲學的中心。所謂中庸，即調和之謂也，即維持平衡之謂也。你試

仔細一讀國父遺教，當能看出他是如何吸收新的政制，如何維持固有之美德良風，務使其互相調和融洽。且有許多引證，都是出於我古聖先賢的典範。此無他，改革固重要，維持平衡亦甚重要也。其獨特之見解，絕非書齋裏發，知微幼雅之徒，日以破壞我國文化，妄殺人民知識，以求達其所謂階級鬥爭的革命目的，所能同日而語也。

你有閒暇，我可以和你多談一點生物哲學。因爲人也是生物，所以生物哲學與人類一切的事情，都有密切的關係，不過今天不多談了。但我得再簡單地說幾句。就是根據生物學。所謂階級鬥爭，便是最不通的一個理論。剛才我講過生物身體是由許多細胞胞成，各個細胞各有其地位，各有其功用，各個細胞間須維持平衡，如果一羣和另一羣爭鬥起來，這個生物必歸死亡。人類社會，何嘗不是如此。我們再看俄國，自帝俄一變而爲列寧的共產。成功了沒有？他不得不改變爲新經濟政策，其實就是在可能情況下，與俄國原來的國情配合調和，維持其平衡。我們都知到史太林的政治，並不是列寧的政治。等到羅上丁希特來打他，史太林竟無可奈何地，喊出了眼淚。如同小孩子被打喊出眼淚一樣，不再喊第三國際了。因爲不知此便不能維持俄國內在的平衡。現在你可以明白爲什麼忘了祖國的狂人們是如何的可憐了。我勸你不要三心兩意。好好讀書，改正你的思想。保持你的健康。充實你的知識。求日方長。在國父遺教無我領導之下，從那你的終身事業。因爲他們是飽有經驗的舵手，必能維持我國家內外的平衡，而使國家一天一天地前進的。敬祝你

四月一日於南岳電任書

· 文 藝 ·

我對文學效用之體驗

種 人

以一個實感於文學欣賞力與創作經驗的人，去就自己體驗證明文學效用，未免有點滑稽感了。但是，無論什麼，如就自己體驗去說，它將有一種特殊的親切性，也特別有趣，是自己的言語，也是自己的思想，雖然鄙陋，總不失為一種自我表現呢，於是這篇文章就在這樣的感情下誕生了。

就我自己的體驗來說，文學效用，有兩方面：一方面是從欣賞上說，一方面是從學習創作上說。

我曾在文學裡總得了對廣大社會的理解，而擴大了我的感情。當我看著許許多多深廣地表現社會各種各樣的文學時，則我置身於廣大的社會中，雖然我所接觸的社會有這樣狹窄，而我對社會的認識是超過自己所有的了。（自然這認識不會很完美）於是我的感情也由個人走向社會，由小的社會走向更大的社會了，這比我所許許多多社會還要有益些，因為它是這樣具體地把各種社會形態顯現在我的面前。

我又曾在文學裡，培養我愛人類，愛祖國，愛苦難軍的感情和意識，當我在文學裡

深切地體會到人類祖國與個人的關係，還有個崇高的觀念（祖國與人類）便開始佔有我的生命。又當我看著許多苦難軍底不幸與他們的純樸生命的文學時，我便聯想起我所看過的，於是，我愛他們，同情他們，我希望能盡力去幫助他們。於是，人類，祖國，苦難軍的愛，不但成爲我的觀念，而且成爲我生命的意向了。這比我讀許多倫理學更深刻地感動了我與潛化了我。

我又曾在文學裡學會了解別人與自己，當我看著許多小說時，我便好用這些方法去試解自己與他人，我彷彿佔有了些穿過人生的表面而達至靈魂深處的奇光了。我也曾在文學的賜與中，改變了我若干思想，如對於貴族生活的憎惡與對於勞動大眾的崇敬，對於保守者的厭恨與對於革命戰士的尊崇……等等觀念的養成，都是拜文學之賜的。

我也曾在文學裡獲得了許多快感與創造觀念。當我寂寞與苦悶的時候，它來陪伴我。引我到許多顯美的世界，而且，有些更發現了一個奇美的環境給我，或者刺激我要我

自己去構思一個奇美的環境，來代替或彌補彌補的現實，觸發與培養了我的生命創造力與生命理想。

總之，文學對於我的社會人生觀與生命創造力的培養，曾發了極大的功能。雖然，我接觸過的文學並不多，而且欣賞力是那麼貧乏，但我將說，我是生活在文學中，我的生命也會以她爲泉源而發展，如一條小魚，生活於小圓塘裏，雖不會游泳於大海，但她確會感受水的賜予而生存。

另一方面，在我學習寫作中，也會得到許多益處，當我要把自己一個觀念——多數還是模糊的——用文學的形式表現出來時，我便要費許多時候去構思，然而，當這個觀念被表達出了，於是，我對這觀念更清晰更堅定地認識了，因此，我往往以學習寫作爲增進自己智慧與確定自己意識的方法。又當我有某一種真實的體驗或情感要發或傳達給別人時，文學便做了我唯一的僕從。由此，我獲得了一種創作的愉快與許多人們的情與溫暖了。而且，我希望（或許是奢望）這些創作於別人有益，如我在欣賞人的作品時，所獲得的益處一樣。

夏 之 心 願

何
冠
來

在那種暫時的、團體的活動中，我是往往忘掉了自己的。現在伙伴們都趁著這假期去滿足自己的心願了，我獨坐在那人散後的宿舍，衣物是如此零亂的，空氣是如此沉悶的。既有含外的蟬兒喚破了此間的寂靜，一種落寞的感覺便在心頭上來。

我回味那些過去的團體中的人物和事情，那會為我感激的，喜歡的，不平的和憎恨的，那不平的，憎恨的，我都予以無條件的寬恕了。

早上還覺清涼，一到中午，天氣酷熱而且蚊子繁多，使人不能安閒地坐上一刻的；於是我找些適宜的地方坐去。

在這涼爽的假期中，我亦如同伙伴們一樣有美麗的正情的理想與心願，去安排自己的生活的；但是，那現實啊，常給我那些理想與心願以打擊，使它不得實現而成為空想了。

而我底可能的心願是甚麼呢？

時日的轉移並不等候人的。在那種衝動的，熱烈的感情之下，我為學校為同輩們做過不少的事情，我常常把公共的，別人的事看成自己的事，因此忙了我自己；不知不覺地在這高貴的貴官里消磨了三年的光陰了。

我是貴者的兒子啊！而能和別的家境優裕的青年的人兒共同在這浩瀚的智識海中，去尋找那最有價值的，最有生命的智識的花果，那是多麼幸福呢？可是，我那樸陋的船兒尚停泊於兩岸相對的海口啊！又是多麼的可羞呢？

現在，有空餘的時間了，讓我計劃我的航程；我的航就是要擷拾那柏拉圖，莎士比亞，李白，杜甫以至湯漢卿……諸大家的心靈和情思的花果，做為我底生命發育的養料的，時日告訴我，一刻也不容遲，快要開船的了。

然而，那年老的母親啊！和我已隔別塵世的三個寒暑了。自從海盜這家的那年，我就遠遠地離開了她，離開了這切的家了，就由她老人家倚門嘆息這兵波掠亂的日子。

是昨天，家里寄來一頁真書，使我知道那小兒靈的任兒患上急症而夭折了；老母病倒在榻上，為了醫治她，家里就欠了人一筆相當重的債。已是老態龍鍾的母親，為這兵燹歲月的憂鬱，更添上深沉的疾病，那容顏必極為衰老的了。

而我這遠遊的人啊！就忍心令那年老的母親長日憶念着出門的未歸的兒子，願與相見一面而不可得，病兼愁苦中死去麼？……

請閱華南唯一大報

中山日報

消息確實 言論公正

銷紙最多 廣告效宏

總社：韶關平治巷
分社：梅縣大康路

梧州大中路
柳州景行街（籌備中）

國民印刷所

擴充營業

增購印機
加鑄鉛字
承印書刊
起貨快捷
印刷精美
價格最廉

·務服而業事化文為·頭前業事化文在站·

樓二店書年青路北度風江曲：部業營
內廠工中大段三四河：廠工

民族青年 第一卷·第二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發行：民族青年出版社

廣東 坪石

印刷者：國民印刷所

廣東 曲江

總經理：青年書店

廣東 曲江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店均有代售

本刊定價表

全年	半年	零售	訂購辦法
十二冊	六冊	一冊	冊數
十元	五元	一元	價目

外埠郵費加一